

破

孽世代之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5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十六期



世代誌異座談會

陳映真
傅大為
王浩威
紀大偉
洪凌
顧秀賢

人間血正延續

廖嘉展
王墨林
鍾喬
李文吉
藍博洲
李男
官鴻志

李疾
張詠捷
曾淑美



來函照登

來自北京的回應

Dear Pots:

各位編輯，你們好！

我是一個北京的讀者，看了九九五·十一·十的POTS的專題《北京搖滾世代》讓我不清楚為何你們要做這一專題。

雖是初探，但是卻也探得太外行，整個專題充滿老舊及錯誤的信息，看來倒像是替主流公司如魔岩這種在大陸失利的跨國公司做大篇幅的宣傳，實在是有違貴報一貫著稱的另類、地下化及顛覆性作風。

尤其不喜歡唯魔岩是瞻的側重性報導。

事實上在北京除了魔岩外，還有BMG的金赤地系列、紅星的紅星系列、音樂家的拼盤系列，鴻鈞的搖滾藝人，Zoom的灰狼及其他獨立的地下團體都有專集發行。

說穿了魔岩頂多就是拿台灣賺的錢到大陸揮霍，嚴重破壞市場行情與機制，賈先生所說之跨國公司在大陸的誇張投資無人能與魔岩相較量。

貴刊所報導之錯誤資料高達百分之八十，如：

(一)郭四雖有做為：但不少欺騙技術，例如黑豹(二)一版兩賣給JVC及台灣點將鄭鈞的合同也出問題，正在訴訟當中。

(二)程進更不是不少騙，撈過魔岩後又整慘了紅星，致使該公司全員改組。

(三)而王曉東根本不是製作人，此人半點音樂都不懂，跟搖滾圈也沒有太大關係，是個道地的奸商，靠著打官司營造自己知名度起家的人，BMG所發行之搖滾北京工是他出資一半，後續財務仍有問題，跟製作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搖滾北京II，搖滾中國III根本沒他的事，這兩張專題是哥哥與一台灣同胞方無行合力作成的。

(四)MIDI中心也不是曹平主持的，他不過是該校的吉他老師罷了。

(五)北京樂隊成立年表，應該是不必刊載的，因為有百分之八十五樂隊已不存在，而存在的

樂隊人員也有變動，對讀者有重大的誤導。

目前北京的搖滾樂已走向獨立製作的趨勢，要地下化及逆反的一代已漸浮現，更多的新進樂隊以更具毀滅性與顛覆性的意識形態登場，如咀咒蒼蠅、羊皮蚯蚓、戰爭、麥田守望者、紫環，我是等新生代的樂隊們，以更犀利的文字，態度與破壞性重力音樂與目前海外所熟知的北京樂隊，劃清界線，他們許多都是搞前衛藝術的作者，有著較深沈的自省性與批判性，他們也才能更正確地展現北京搖滾的原貌與地下文化現象，基本上是崔健的同路人，我覺得新一代的音樂人更適合貴刊的屬性。

各位編輯女士先生們，僅就台灣主流公司出版的大陸搖滾做為論述的議題，那絕對是搞錯了方向，尤其是「魔岩三太子」，在市場上銷售的搖滾認同就遠不如BMG的「赤地系列」，在操作手法上，赤地系列更地下化。反商業媒體和北京那些獨立製作站在同一陣線上，與崔健所謂的「搖滾植根」的構想更靠近。

反而像賈先生那樣對台灣的地下樂隊不屑一顧的態度就可以明瞭，魔岩是如何地將搖滾與流行音樂同質化的心態，事實上，我也聽過一些台灣地下樂隊的小樣，其中充滿不同文化基礎所應產生的生機，對我們而言是新鮮、可喜的，也很願意多聽到台灣地下樂隊的更多作品，為何賈先生要刻意的打壓呢？

希望下次如果觸碰到類似的話題，最好能親自走訪北京，或是找識途老馬領路，千萬不要被主流公司，無知的被利用了，而嚴重地影響品質與喪失正確的批評根據，固而造就出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專輯，對文化交流功能而言會造成極大誤解，不是件好事，也無益於兩地地下樂隊的發展，只有更多的不解與不平之聲出現，如果兩地新人類地下文化有更多的包容，我想是可以形成一種互動與活動的交流網絡那不是很好嗎？

以前，我透過台灣在北京的朋友取得貴刊，也十分喜歡閱讀貴刊，可洞悉台灣地下文化與俗文化的脈

動，如今看到初探北京搖滾世代的專題，令我不禁懷疑之前貴刊所載的台灣方面的地下文化現況是否客觀，亦受商業宣傳活動所左右，也許像我這樣而少之又少的大陸讀者所提出的疑惑，對你們是多餘的，但我仍然要給你們一個忠告：「次文化戰略，是從內部顛覆，利用體制內最腐朽的那部分機制，加以琢磨，深化其荒謬性，並耗費其規格化意志，再創造性地創出驚天駭地的潛質能量，巧妙地入時尚縫隙，以更俗化的嘲諷與對立、製造運動。」然諸君在此未能良好地掌握「體制內最腐朽的那一部機制」，擴大視野地為地下文化，融合更龐大的力量，反而被主流所宰制與愚弄。

如果我的建言有何不禮貌的地方，諸多見諒，是因貴刊激發我的感動，才讓我出此回應，我想在如台灣當下如此民主的社會中，也應屬良性互動，這是中國所沒有的意識形態與言論自由的對壘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請善用並珍惜你們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祝發刊順利
良心的抗爭者

北京·高斌
1995·12·3

編輯室手記關於此篇的回應，於下回刊出。先禮後兵是破週報一貫的風尚。同時，再說一次來函照登不代表本報立場，當然也不同意其所言的所有內容。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lihpao@cc.wej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一幺、人 2367116-227
破週報徵廣告AE
由於在破報工作是件非常光榮的事，所以名額有限，請你一定要以跑百米的速度來應徵哦！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第十六期 歷史的人間的 透過世代差異尋找自我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西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文字主編：李安妮、林秀麗

美術主編：王以倩、羅文祥、李瑩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賴淑雅、萬倍琳、王錦華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江晉廣、郭達年、陳雪

洪凌、吳宛菱、粘利文、邱莉燕、紀大偉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 Address: lihpao@cc.wejc.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

(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你要站那邊？

撇開讓我們覺得無可置喙的××大選，在這紛紛擾擾的時局裡重新回顧「人間」以來台灣文化性刊物的變遷，與其說是想企圖藉此建立一套「左派法統」的大敘事來確定自身的合法性，毋寧說是想更確切的發掘存於不同世代間的異同，讓我們更具意識地邁步向前。

如果長期遭血腥鎮壓曾經是數代以來悲憤不已的緣由，現今正邁步行至而立之年的「單世代」們能做的只是不斷地頌頌這些早成 cliché 的魔咒，或是縱情於新世界炫麗耀目的消費黑洞嗎？我想不管是那個世代的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拒絕如此的控訴，然而，你做了什麼？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不管做或不做，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會被捲入這歷史的洪流裡，只

不過有人選擇了掙扎、頑抗，有人選擇了操弄、控制，還有人選擇隨波逐流或是不做選擇。殊值玩味的問題是：如果你有「機會」，你會選擇什麼？「世代誌異」的有趣之處正在於它讓我們看到了某些人在不同時代裡所得到的機會與他們的選擇，給我們一個鏡子看看可以怎樣別出心裁地搔首弄姿。

想到陳映真新釘鐵地說：「人間」復刊的機率在零以下。好啦！所有的大老總會有出場的一天，問問手裡資源漸豐的我們「要怎麼做」，答案不再是癡人說夢，而會是即將到來的「現實」。儘管新時代裡媒體的力量不若昔日那般的可漫天蓋地，人們用媒體來交換思考、連結群己的習性依然不變，怎樣讓批判性的論述、實踐能持續地再生產與壯大，仍舊是新時代基進文化刊物與其世代的不二要務。

破週報第十六期目錄

人間十年

A HISTORICAL MIRROR of GENERATIONS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讀者來函 LETTERS
- 3 破論 TEH POTS VIEW
- 3 目錄 INDEX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欄 COLUMNS

- 5 台北之眼—台北邊緣
- 5 搖滾游擊手筆記
 - 自主實踐的經驗
- 6 絕美的電腦魔癡叛客
 - 攻佔母體的老大姊
 - 電腦叛客的滅絕
- 6 入妖政治篇
 - 超市漫畫：
 - 漫畫雜誌的今日與明日

專題 FEATURE

人間十年

- 7 人間十年專題
- 8 訪陳映真
 - 11 歷史的鏡子
 - 世代誌異座談會
 - 12 陳映真：歷史偶然的遭遇
 - 13 傅大為：
 - 邊緣切禁驕傲
 - 14 王浩威：
 - 左派啞啞不如同志
 - 顧秀賢：
 - 發起寫書運動之必要
 - 15 洪凌：
 - 既有權力架構失落的恐慌

- 15 紀大偉：
 - 歷史像牛排一樣厚重
- 16 從相機快門到心靈快門
 - 專訪張詠捷
- 17 拒絕吃鏡頭鴉片的李文吉
- 18 麥子不死 - 訪廖嘉展
- 19 那美好的仗她也打過 - 訪曾淑美
- 20 用底層的聲音煮一鍋的好粥 - 專訪官鴻志
- 21 進入寬廣的文化江湖 - 訪李疾
- 22 沉澱白色恐怖記憶的藍博洲
- 23 踏出國際的草根實踐 - 訪鍾喬
- 24 撕掉標籤重新作人的王墨林
- 25 人間風格塑造者 - 訪李男
- 26 強調真實美學的報導文學
- 27 開放對談的空間



已出的 POTS

- 試刊號、第一至九期直接對撥本社，九折優待
- 試刊號：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定價：30 元）
- 第一期：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定價：50 元）
- 第二期：夏娃的藝術（定價：50 元）
- 第三期：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定價：50 元）
- 第四期：好玩女人（定價：50 元）
- 第五期：學生萬歲（定價：50 元）
- 第六期：美國帝國瘦身子民（定價：50 元）
- 第七期：場道橫行（定價：50 元）
- 第八期：反媒體行動（定價：50 元）
- 第九期：連環環環（定價 50 元）
- 第十期：當代傳奇（定價 50 元）
- 第十一期：北京搖滾世代（定價 50 元）
- 第十二期：革命一起來（定價 50 元）
- 第十三期：美國獨立廠牌四十年（定價 50 元）
- 第十四期：愛滋紀念被單（定價 50 元）
- 第十五期：愛滋人權步難行（定價 50 元）

性別

■十月九日

黨派放兩旁，婦女權益擺優先
立院將成立跨黨派婦女政團

國民黨的朱鳳芝、民進黨的葉菊蘭及新黨的高惠宇等甫當選的女性立委，在現任女性立委呂秀蓮所舉辦的「第三屆立委選舉對女性參政的啓示」座談會中，共同承諾將在立法院成立婦女政團，推動有關婦女權益的問題，不受黨派立場的限制，並廣邀各黨派的女性加入。民進黨外交部主任黃美幸，並砲轟民進黨是最不進步的黨，因為民進黨提名女性參選的比率為百分之七點四五，遠比國民黨的百分之十四點三九、新黨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二來得低，而民進黨中央黨部還要求「黑貓助選團」到處站台、唱歌助選、拉票，只把女性當選舉工具，而非參政主體。

■十二月十日

「為防治愛滋而走」多醫生護士
缺乏民衆自主參與

由台北市衛生局主辦、中華民國預防醫學會承辦的第四屆「為愛滋防治而走，因為我關心」健行及義診活動，在微雨的台北天空下展開，為十二月一日起的「國際愛滋紀念被單展」紀念活動劃上高潮的句點。「愛滋步行」(AIDS)是全球為表達對愛滋病感染者的關懷及支持防治愛滋決心的共通活動，在台灣，由於民衆害怕被認為是愛滋病感染者，故將此健行活動更名為「為愛滋防治而走」(Walking for AIDS)。本次活動約有一千餘名民衆參加，可惜的是，其中大多數是衛生單位和各大醫院動員而去的員工，而不是自發性的參與者，這顯示國內的愛滋運動仍有待突破與官方的關係，強化民間力量。希望明年的「為愛滋防治而走」能展現出不同力道的風貌。

■十月十日

]婦女人權不及格，台灣不是女人住的地方！

中國人權協會公佈台灣地區八十四年度人權指標報告顯示，經濟、社會、司法、文教等人權指標變化不大，但婦女人權指標卻大幅滑落，各項指標都不及格，「人身安全」平均只有一點八九，「社會參與」為一點九九，婦女教育權則從去年及格的三點一〇降為不及格的二點九九。這樣的女權狀況，教人怎能不生氣，不憤怒地說：台灣真不是女人住的地方！

■十月十二日

被騙來台賣淫，泰北女孩有家歸不得

泰北女孩被騙來台賣淫，卻因泰國政府不發予身份證，而被迫留在三峽的收容所，無法回國與家人團聚。為此，終止童妓協會、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婦女團體，聯合舉辦了「泰北婦女何去何從」的座談會，希望各相關單位不要再將這些少女當作「人球」踢來踢去，盡早讓她們獲得身份證，得以返鄉。

藝術

■十二月八日

「魅登峰」不能演《甜蜜家庭》

「台灣第一街——延平街」事件已暫告一段落，主事的台南市政府也開始秋後算帳，台南市文化基金會總幹事沈秀燕因對該事件態度與市府相左，被降職為推廣組組長，而她在總幹事期間成立的全國唯一老人劇團「魅登峰劇團」兩年前以《鹽巴與味素》一劇一炮而紅，為許多台南地區老人找到生命的第二春，但這半年來也受到市府排斥的臉色，最近更傳出基金會將不再補助「魅登峰」的消息，而進行中的年度大戲《甜蜜家庭》也因文建會的補助無法支應面臨中斷命運，「魅登峰」在可見的未來可能將因此被迫解散。

鍋

事

營養的
美味的
在精不在多的

攝影/李宜昌

■十二月十二日

李登輝興起亂放話
電影有錢拿

李登輝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侃侃而談國片電影時，陶醉的笑臉中順口指示了未來國家文藝基金會應該補助電影、輔導國片發展，害得剛上任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執行長陳國慈不知所措，馬上翻閱了「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結果果然在第二條藝術事業項目裡找到了「電影」的項目，但奇怪的是過去明明每年都是新聞局在輔導國片，不是文建會，李登輝總統一時興起亂放話，凸顯了兩部會業務的模糊與尷尬。

媒體

■12月11日

藝術教育法草案立院初審通過，免笑！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初審通過「藝術教育法草案」，依規定，將來大專院校、高中及附設國中、小，都可以設置音樂、戲劇、舞蹈、美術、工藝、影視等專科學校。不過出席立委對於要不要有藝術小學

、國中設立，發生爭議。其實，以院會法案大塞車的情況下，藝術教育法草案何時能排入議會審議都未定；立院諸公大可慢慢考慮這個問題，或者，我們也可以請小朋友來個藝術公民投票。

■12月12日

台灣藝文「反攻大陸」！

繼「兩岸歌仔戲聯合實驗劇展——李娃傳」十月在台北演出後，老字號的台陽美術協會亦將首次大規模渡海到大陸，明年四月在上海美術館及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雖說兩岸美術活動近年來交流頻仍，但多數仍是大陸方面的藝術家及作品來台展出，炒熱市場的經營。這一次，台灣在對岸的展出祭出曾經「歌頌帝國主義」的台陽老前/錢軍，帶領台灣藝文界金光閃閃反攻大陸！

COLUMNS

本週稿擠，所以紀大偉、陳雪、粘利文以及林正欣等四人的專欄暫停一次。美艷小編輯在此向各位讀者道歉。另台北之眼、人妖政治篇、以及電腦魔瘋叛客專欄本週結束，請期待新專欄的亮相。



Email: lenguo @hkstar.com

文 / 郭達年
(香港黑鳥)



文 / 江晉廣

台北邊緣

掀開再雕飾再名貴轎車的大嘴，常有人難以接受在它滑膩銀亮的皮膚下，藏著烏黑猙獰且喘哮如獸的鋼鐵內臟，盤錯糾結如煙霧蒸騰直似微型煉獄，和它的主人沒有兩樣。相同地，從台北市通過淡水河進入台北縣時，也會感受類似的驚惶，經由連接並改變一切的橋，人們由第一世界掉入了第三世界，從緩靜的住宅區掉入了巨大轟然的廠房。河兩岸住民的命運，牽鎖在共享名姓兩邊土地之身世，是一對命運相差雲泥的同卵雙胞胎。於是，台北市是台北縣的期待，台北縣是台北市的潛意識，前者只有在處理垃圾問題時，才會承認彼此的兄弟關係，而後者卻屢思夢想，翹盼有一天兩方能血肉相融合為一體。

猶如跨越兩個地理和心靈國度的邊界，從東到西，台北的體味慢慢淡了，台灣的氣息則漸漸清晰可聞，必需離開了台灣即將蓋過台北的過渡區——泰山，才會真正來到另一個天地。而擺盪在兩國之間的泰山，總進退兩難。

一棟棟簇新的公寓，一間間超市與便利店，從不掩飾侵略野心的台北帝國，攻陷了泰山半壁江山；夾在高樓間將休克的矮垣短壁，被啃得崎嶇殘缺的綠地，敗戰的台灣！在泥塵裡無力地掙扎，無力地繼續往後退卻。就像所有的過渡期過渡區一般，法律、秩序、清淨只是課本才存在的概念，在這

裡，只有擁有百獸般堅韌的能力，才能從容不迫地在橫行直衝的貨車砂石車陣中蛇行自如，才能在轟隆如末日的噪音裡如貓沈眠，才能在台塑及眾家地下工廠污染的廢水廢氣環境裡，依然吱吱喳喳無憂若麻雀，依然蹦蹦跳跳健壯似有相同身世的忍者龜。

但卻有人執迷於這個城市的邊陲，它是最古老傳統和最新興冒險投機並存混合的熔爐，滋生並保護各類突變基因的熱帶雨林。賭博、大家樂、第四台、地下電台……，這些拖動時間軸前進的巨獸們，皆出生於如泰山般半城半鄉之地，以妖怪長大的方法和愈打壓愈強大的生命力，暴虐地奪取資源，各派別的羅賓遜及威廉斯爾，當然還有廖添丁，在山頭叢林裡征逐笑傲。並從此進可攻、退可守之要塞，左攻台灣，右打台北，有如叱咤蠻魯的游牧民族，帶著不知名的武器跟嘶吼奔馳殺來，潮水般地氾濫整座島嶼，更跟著改朝換代更替文化霸權。但雖然英雄代代輩出，不過最後卻總會移民離開這個被他們凌虐過的地方，等著新的英雄出現，直到它的養分完全被吸乾為止。

再過幾年，泰山便會完全淪落，留給那些見證死亡的人，是永遠拯救不了的鄉愁。如同拒絕長大的小孩們，被判了永世流浪的命運，因為同樣逝去是再無法生產出來的多愁善感，和如精神分裂般的自由。

自主實踐的經驗

在自己的搖滾旅程上，我見過兩種不同的出路：一種在青年時代被這種言語迷惑，並嘗試透過它去尋找自我的人，因為建立不到一種可足維持的工作模式，最後，唯一能把它保存在自己生活裡的出路，就是把它事業化（careerize）——成為唱片店主、唱片公司行政、製作人、樂評／DJ、或者音樂影像工作者。創作，僅成一場舊夢。另一種，因為找著一種不願放棄的自我價值，在工作模式上，愈愈的傾向以簡約化，以獨立形式或同群集作去遠求一種可足維持性，正因為，唱片工業的日益擴大和繁雜化，雖然似乎拓開了新的樂眾群體，但在支援個別創作者的運作上，並未因資源的增加而有本質上的變異，在創作者和代理者之間，商業利益始終成為一拉倒的引索。

由直系小群（創作者友朋圈加大一倍）到地區性的草層（城市的全域），再到本地（國內）和國際的全廣面（世界發行），作品流量本身提供了兩個支點：一是創作再生的經濟資源，二是迴注的創作欲望（rejuvenative desire），一條歌寫了出來，它產生的回動力，乃可引發另一條歌的誕生，即使不一定必然，很多時候，欲透過已立廠牌去推發作品，對非事業化的，重視創作的真確生命價值的人，索求的，更多是後者。

通常，在一個典型的大城市，上述的直系小群該在三百人之內，這個流量，很難產生一種可足

維持（例如說，五年）的迴注欲望。一般而言，透過地區性的草層，如果作品不是完全的庸謬（mediocre），應該可以達三至五百的流量，但由此階段，完全自行主理的運作會開始出現工作的壓力（想像像沈懷一這樣的創作者直接服務要每天送貨！）。如果能有一些小群的共分網絡，足躍至全國及國際的流通，流量也許可以達到二千。在這個觸面，一個作品能產生的資源和精神迴量就比較接近「可足維持」的理念了。

黑鳥在香港持續工作超過十年，也就是由這樣的模式慢慢的成長過來，除了九〇年的作品〈民衆擁有力量〉曾在台發行過外（代理水晶唱片報告說賣了一千三百多），其他的，都透過各地的草層網絡流傳；迄今，共出版的四個卡帶作品，每一個都已經超過三千，共有萬多個卡帶的流量；由於我們鼓勵樂友把卡帶翻錄給不願或未能購買的朋友，聽眾量和流量不是一比一的。在香港及以外各地，我們收到的大量（來自各地近千的來信、卡）聽眾迴響，健康地令創作的精神志念不斷得以更生。

單流量算，和以銀彈企劃促銷的主流出品，那固然是一個極少數；但如果也考慮其相對地極度簡約的工作模式和實踐性質，這些作品的社會烙印，比流量大但停駐短的出品，實證了它本身的生命力。

精神分裂般的自由。的命運，因為同樣逝去是再無法生產出來的多愁善感，和如精神遠拯救不了的鄉愁。如同拒絕長大的小孩們，被判了永世流浪再過幾年，泰山便會完全淪落，留給那些見證死亡的人，是永

身的生命力。這些作品的社會烙印，比流量大但停駐短的出品，實證了它本數；但如果也考慮其相對地極度簡約的工作模式和實踐性質，單流量算，和以銀彈企劃促銷的主流出品，那固然是一個極少



山頂人茶園
寒舍茶坊
品茗·茶葉茶具

早上 8:00 - 凌晨 2:00
(國定假日 24 小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3 段 40 巷 6 號
電話：9384884 · 9384934

專欄

超市漫畫： 漫畫雜誌的今日與明日

另類漫畫若以美國電影分級制來套用，也各自呈現 X 級、R 級、A 級、硬調 (Hard core)、軟調 (Soft core)、地下出版等各種內容與風格。嚴格地論非成年漫畫出版物的經營，與市場導向，雖有專業的廣告經銷書針對創作者而撰寫，最具體有成效的推銷術，在台灣似乎要算是漫畫便利屋的租界版圖了。至於成年漫畫，在美國則有專門店之漫畫門市可找到蹤跡，在日本，則每十家超商中就有九家販賣成人漫畫雜誌，內容全是限制級，合法地陳列架上，閱者或買者也不以為異。如定價一本二百八十丹的《笑太郎》(ベニスの笑人) 色情笑話雜誌，內容以四格短篇為主，性娛樂文化在完全沒有審查尺度可言的畫刊中充斥了生殖器官開放的爆笑情節。

日本是個賭色皆可合法經營的國家，他們把性看成活化的家常便飯，在商業系統中，性與色慾也屬販賣的商品意識，沒啥好壓抑或抑制的。眼看台灣市場，全是限制級以下的漫畫雜誌，而且還大都是港日授權的翻版，難怪感到枯燥乏味的讀者全跑去購買原版，或尋求另類管道 (如 Fan Zine) 去結交通訊好友和漫畫同志。

讀者的分家也是漫畫口味紛雜成立的主要因素，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歡的文類終而動筆自己揮毫的人口也大有人在。有多大的漫畫市場就容得下同樣大分量的從業者，而且正在遞增之中，如果五年後有人投資開了一家 Comix Super Market 也不嫌誇張。大量複製與販售的成長是無可限量的，有朝一日「漫畫國際」的進軍也不難期待能在下世紀搞得有聲有色，但這時對於閱讀受眾之齡層而作的細目分級時代亦隨之來臨。

據我大膽預測，正如電影分級制一樣，都是為了分類以利統治管理之便，如果漫畫類出版也依此法，則就官方而言要處理情節刪竊、著作權被媒體亂用、遭出版商任意改鑄之麻煩時，就有所依歸。畢竟，漫畫發行事業並非單純之行業，但由於台灣官方懶得管，所以成了放任自由的一片天空。

也許漫畫就像夢一樣，是一種無法於現實中處理的影像糾紛，然而漫畫評論則是一片前景看好的夢土，值得期待。西方除了漫畫販售書目專刊的發行之外，還有許多不定期的酷迷刊物和月刊

對於漫畫的深度報導，也是漫畫人口集結的天地，內容有訪談、評論、回顧、訊息介紹等。此外，拍成動畫 Video 的漫畫商品也不少，如寶麗金 (Polygram) 發行的 Viz: The Documentary (1990) 曾在英國電視台第四頻道播過，製成專輯帶上市。Acme Video / CAProductions、ICA、Photon 等家英國製影業商也製作了不少漫畫繪家的紀錄片。

目前英國的 Fan zine 有 British Comics World、Comic World、Comic Cuts / ACE Newsletter、Comic Journal、Comics Forum、Comics International、Golden Fun、Zum! 美國發刊的則有 Comics Arena、Comic Buyers Guide、Comics Interview、Comics Journal、Comics Scene、Comikaze!、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Mangajin、Wizard。巴黎則有 Les cahiers de la bande dessinée，米蘭有 Fumo di China。在國外的酷迷店 Speakeasy、BEM、FA、Ark、Comic Media News、Comic Reader、Amazing Heroes 可獲相關資訊，而漫畫期刊也可讀到這類文章。全世界漫畫流行的時代似乎已經剪綵開幕了，讓我們跟著 Comix Newave 的腳步一齊走吧！



新專欄預告！

下週新專欄的名稱是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專談詭異有趣的書籍

攻佔電腦母體的老大姊 ——電腦叛客的「滅絕」？

文 / 洪凌

e-mail address: l. Anti - Christ.
bbs@bbs.ntu.edu.tw2. queerkid@
vicky.nsysu.edu.tw



也許，萬事萬物並沒有所謂的「神聖、同質性的起源」，沒有開始也沒有終點。然而，在文本與超度現實 (hyper-reality) 的無限延異過程，那位遊戲個不停的「主體」，不禁讓我聯想起某些漫畫或奇幻小說中，身陷於「地、水、風、火」四大元素之間的情愛糾葛，嘗試著變異肉身或精神的黑魔術師之類的角色——不知死活地玩到頭來，術師終於領教到「客體的致命魅力」(the deadly charm of the object)，終於不無愉悅地獻身於那個變幻莫測的無情宇宙。同樣地，我們是否會在某些心神狂醉、無法自己的剎那，興起一股詭異的情慾，一種勉強說是「對於滅絕的渴望」(desire for ex-termination)？是的，這樣的渴望形現於血肉模糊的物質性三度空間，也見諸於科幻小說的種種章節，更是電腦叛客遊走於「現實荒漠」(the desert of the real) (註1) 的關鍵性悸動。這種感覺很鮮，但是又不全然陌生，就像我們常常在極端的快感頂峰突然興起「就這樣死去吧！」的衝動。在網路串聯著網路的當下

，異度空間的無遠弗屆讓異盪其間的叛客小鬼感受到波西亞 (Jean Baudrillard) 所說的「通訊的狂迷」(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而在最基本的 01 字元所構組成的圖像/文本世界中，一切都是完美絕倫的「擬仿」(simulation)。若要對抗無所不在的擬仿、主體的消融，最吊詭的策略就是波西亞老鬼在〈象徵性交易異以及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中提及的，「死亡必須要拿出來玩，以抵抗另一種死亡」——我猜想，那大概是說當你可能被體制的父性結構 (無論是後資本的跨國組織也好、微細的家庭監管系統也罷) 搞得奄奄一息、沒有生趣時，趕快假死暫死小死亡 (petit mort) 吧！讓電腦母體 (matrix) 的子宮，成為你可能的滅絕場域與再生契機。沒有錯，我們需要自我滅絕，來讓自己與任何共謀關係絕交。即使是電腦叛客，也「絕對」有和體制共謀的嫌疑。在這一刻，寫著本系列的終章，對於我既愛又惱的電腦叛客現象，我無法不讓它們經歷「在科幻小說中，在擬仿的頂點，系統回歸到自我毀滅的境地。」(註2) 身為這個現象的一份子，它的奇觀與愛慾模式的共生者，我最無法輕易放過的，就是這些絕大多數在生理上是男性、在種族上是白人、在性別上是異性戀、在階級上是中產或中上位階的寫作者、論述者、甚至專業的「資訊小偷」，都不願意承認自己身為某個特定的身份 (specific identity)，更不可能坦白本身挾帶的優勢與不可諱言的共犯情意。是的，一旦你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弱點，硬生生地以既有的反抗姿態來頑抗後起的批判聲音，這就玩完了。我不得不說：在這一個不可能純粹的高度擬像宇宙，至高無上的激情與銘記，可能只不過是老大哥在你的腦髓裡安放的操縱繩索，讓你擱淺在爽到沒有辦法思索的臨界點，就此——形銷神滅！從現在「這個瞬間」為原點，可否讓我們開始想像，在滅絕了專橫男性意象的電腦叛客之後，電腦母體是不是就此成為一個自主的子宮，生產自我所欲的女兒？甚至，和自己的女兒交歡……也許，這是幹掉老大哥的老大姊，踩著狂喜而腐化的電腦叛客陽具，奸笑著出生的儀式？

註1
見電腦叛客論述〈惡搞現實場域〉
(Storming the Reality Studio)。

註2
文出於波西亞的〈象徵性交易異以及死亡〉

八十四年十二月

人間

專題企劃\編輯部
專題攝影\丘德真 李宜昌

有位以前破週報的同仁，說今年是 1995 年，而〈人間雜誌〉在 1985 年十一月創刊至今，剛好十年，說：我們來作人間專題吧。作〈人間〉專題，還有其他理由，例如在坊間，〈人間雜誌〉的折舊率是最低的，周邊有許多同學朋友至今仍唸唸不忘人間的啓示，要起身實踐，或作紀錄片，或走報導文學的路子。

當然，作人間還有個內部的因素，破週報的編輯部有許多人喜愛過人間。這個想法進到編輯部討論之後，我們仔細想想我們這個世代所受到文化性刊物的影響，似乎不只〈人間〉、同期的〈當代〉、或者之前之後的許多雜誌刊物，都曾像學術明星般的吸引我們，然後我們決定要作個世代的故事，講講〈人間〉的那些人，現在到哪兒？作什麼？等等。

找遍坊間關於世代的故事，令人絕望。許多世代的故事，彷彿述說著同學朋友之間的情誼，和如何變成今日社會主流位置的霸佔史，讀完之後，發現這是一幕社會位置分佈圖，一幅相互取暖、相濡以沫的中產階級情誼。要找出世代的面貌，憑藉的恐怕不是尋找自畫像似的一個鄉愁的回眸，而是透過差異來顯露自己。正如傅柯所說的：「人是唯一自己目光的盲點」，要透過鏡子，透過差異地點，才得以相映出自己及所處的情境。

於是，我們開始擴大想法，「世代誌異」是一個嘗試，我們選擇了台北的一個小劇場「台灣渥克」，作為發問聯繫的起點。〈人間〉長出的肉，則試圖藉由當時參與人員的生命歷程，來完成人間系譜學的延續，關於〈人間〉曾經報導過的事件，我們擬在下期的破週報繼續。

希望，這樣的作法是對〈人間雜誌〉最好的「致意」。

人間
十年

07

專訪陳映真

整理\邱燕莉

●臨近台灣解嚴的那幾年，在社會力將發未發的生活裡，大眾媒體毫無任何自主和尊嚴可言，您當初在籌辦《人間》時，對它的想像是如何的？

陳映真（以下簡稱陳）：作為商品，雜誌不是信息的媒介，而是商業廣告的媒介。

因此，一個雜誌首先必須確定它要給誰讀，它有行銷的一套。譬如鎖定讀者是十八歲到二十一歲，學歷高中或專科，薪水每月兩萬到兩萬五，一週工作幾天、餘暇有多少時間等等，都算準了才設計相應的編輯方針，以吸引大量的發行，增加每頁的廣告價格。

它不是「我有話要說」所以辦雜誌。從歷史上看，很長很長的一段時期人們辦雜誌，是因為「我有話要說」：《新青年》、還有著名的《獨立評論》，這些對思想起大作用的雜誌，都是一些窮讀書人爲了宣揚自己的想法辦的雜誌，裡面頂多是書和文具的廣告，硬是一本一本賣，貼錢辦，當然是編輯部主體。雜誌的發展史就是從編輯主體向市場主體移動的歷史，現在第三世界還有一大堆這樣的雜誌。後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人變成消費的工具以後，雜誌就往市場那邊走了。台灣雜誌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到全世界各地去看，所有的雜誌都是俊男美女、月亮星星、歡笑幸福，這是因為消費性雜誌以俊男美女、幸福健康、有錢有閒的人的立場看生活、看世界。其次，消費的目的，是舒適、幸福、便利、享樂，做為商品廣告媒介的雜誌，要配合商品的生態，當然要編得美麗、幸福、健康，與商品廣告配合，相得益彰。資本主義市場下的雜誌不得不世俗化、物質化、庸俗化...，有客觀原因的。

是以，我們辦《人間》是逆流而上，卻又拒絕成爲一種同仁雜誌。搞同仁雜誌，容易搞關門主義，同仁小圈滿足就行了，難於走入生活，爭取群眾，結果雜誌銷不出去，經濟拮据，關門而後已。「進步」小雜誌多半是這個命運：思想「激進」，做工、文字、效果粗糙，紀律鬆散，短命而終。編輯主體與市場效益彷彿成了絕對性矛盾了。

因此，籌辦《人間》的時候，我們想把編輯主體與市場效益這矛盾的雙方統一起來。我們堅持編輯主體，不搞媚俗，但又是人們愛不釋手的雜誌。從商業的觀點也好，從世俗的觀點也好，絕對要使人覺得它好。所以，我們既不能搞同仁刊物之艱深拗口，同時也不能搞成整價的「愛心」雜誌。另一方面，我們得用一切手段來通過市場殘酷的選擇。市場看似稠潤的金山銀山，其實也是殘酷冷血的修羅地域。要堅持原則又要通過市場考驗，難度很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採用了一些市場手段。用上紙精印，版面的編排，下標題要既有深度，又能「賣錢」……

這當然是一條險路，因為從沒有人這樣走過。而且事實也證明，《人間》雖然受到很深很深的懷念，公平地說起來，這樣的雜誌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理的商品。《人間》能夠撐四

年，已經很不錯。許多外國人看到這份雜誌，都很驚訝，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雜誌？

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們在辦雜誌之前，和一些年輕朋友花了非常長的時間討論一件事：這是什麼雜誌？她的宗旨是什麼？

●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陳：約莫

用了十九個月。沒有一個雜誌像我們這樣，溝通夠之後才出刊。而且十九個月中，每個月都發薪水，雖然很低微。籌備期間還出過一本試刊號，四平八穩的，後來覺得不行。後來找到平面設計藝術家李男，他的確很有天份，若沒有李男，《人間》的性格出不來。

他也愛死了這個雜誌，每期都訂了幾十本送給別人。《人間》雜誌關門，他難過得要死。

要一個雜誌有鮮明的形象，編輯部就要有明確的宗旨。因為雜誌是死的，它的生命是編輯部賦予的，這宗旨不能含含糊糊，要能明確地以文字記載。這個明確的宗旨，為編輯部的同仁所理解、接受，在採訪、編輯實踐上遵行。舉個例子，同樣是穿著白衣服的人，你到底是醫生？廚師？還是按摩的，自己必須搞清楚。

結果，我們討論出來的宗旨有三條，被我戲稱是《人間》的憲法：

1.《人間》雜誌是以文字和圖片兩種語言媒介，來從事台灣生活的記錄、見證、發現與批判。

2.《人間》雜誌要以社會上弱小者的立場，去看台灣的人、生活、社會、歷史、生態環境和世界。

3.《人間》雜誌不相信「純粹」的「客觀公正」，要有自己的立場，但又不以立場取代事實，因此就要求辛勤的調查研究。

編輯部在討論第三條時，花了比較多的唇舌。報導工作中一個強而有力的迷思，即所謂的「客觀公正」。很多人喜愛《人間》但卻感到憂愁，他們問我：「陳先生，你們會不會太激進了？」「這篇文章會不會引起社會的不安？」有人則是認為《人間》偏頗。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當時被認為偏頗的報導，現在已經成了常識。

此外，我們特別對「人」有興趣，人是一切



漫畫\野人

關心的焦點。我們學會了「以事寫人」，即以人的具體生活、行動、思想、感情、遭遇、選擇等等來敘事寫人。另一個學會的是「由人寫事」，一定從與事有關之人的經驗和立場來寫事件。

可見《人間》是反潮流的。當電視劇、副刊的文章塑造了一個虛構的社會，那樣幸福的社會，那樣的青春美貌，那樣的長青不老，而你永遠看不到像出現在《人間》裡的平凡的民衆（nobody）。《人間》改了一個角度去看世界，世界真的不一樣起來，這也是她會引起廣大效應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說是弱小者呢？

陳：菜市場的乞丐婆身旁常有小孩子睡在地下，我一直有一個疑問，怎麼小孩子睡在那兒？人來人往的怎麼睡得著？我猜是小孩子裝睡當媽乞討的道具來分多一點的錢。但是裝睡是很痛苦的事，特別是叫小孩子裝睡，我都懷疑是不是大人餵他吃安眠藥！

有一回，我看著看著，那個小孩子突然醒來，眼睛咚地張開，他看著我，我也看著他，大概幾秒鐘，那個完全是剛醒來的眼睛。我的心裡想著這個小孩，他和一個從小生長在陽明山仰德大道、讓菲律賓女傭帶大的孩子，一個是睡醒見到來來往往厭惡憐憫的眼光，一個是萬家燈火在腳下，這兩個人對於世界的看法一定非常不一樣。

有人曾血淚迸流寫信告訴我們，說他非常喜歡《人間》雜誌，但是從今以後他不要再訂了。為什麼呢？他解釋說他每天工作已經夠苦了，回家看到雜誌，起碼一個禮拜睡不著覺。「我能做什麼？我捐了錢你又退回來，又沒有解答給我，你叫我怎麼辦？每次看每次都很心痛。」他說。

上文續接第九版



下文續接第八版

●大家都對《人間》引起的廣泛影響力感到好奇，某些朋友總強調著《人間》對他們成長的影響，到底《人間》的魔力在哪裡？

陳：有一次，一個大傳系的女學生在我演講完時跑來，她人未語淚先流，我嚇壞了。她怯生生地說：「陳先生，我一直有個願望，只要哪天見到你時要對你說聲謝謝。我是從小看《人間》長大的，看了《人間》，我才知道報紙不能盡信。」說完，一個鞠躬就走掉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若無《人間》，這位女學生很多事情都不會知道。以前她的資訊是來自正常的主流媒介，而《人間》這份非主流、逆流而上的媒介，讓她認識了這個世界，並讓她要立志做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我想，大概是這樣的，台灣的學生越來越資產階級化，很自然的，這樣的小孩會跟具體的生活脫節，《人間》這份雜誌使他們張開了眼睛。

《人間》關門時，有人安慰我不要難過，他說：「我們的社會爛死了，沒有希望，不配擁有這麼好的雜誌。」弄得後來，反變成是我在安慰他。

●由前面的談話可知，《人間》背後是有一套龐大深刻的思考，亦對資本主義造成的弊端有所反省，但是，翻開它內頁卻不乏跨國企業的廣告，為什麼呢？

陳：最引起爭議的是杜邦公司的廣告。連紐約時報也都不會發生像《人間》這樣的事，我們的讀者連廣告都管，而且管得非常嚴厲。《人間》是帶頭反杜邦成功的，她讓外資在未設立前就棄甲而逃，這在全球的環保運動中是相當罕見的。

但是，我們登出了杜邦的廣告，讓編輯部門和廣告部門產生了矛盾。廣告部希望《人間》

活下去，但當時我們新訂鐵則決定，洋煙洋酒的廣告一律不登。可是，後來我們決定上杜邦的廣告，為什麼？假如去翻開那一期就可以發現，那是廣告杜邦公司控制污染設備的，但讀者不察，打電話來問罪。

杜邦以污染成名，卻也以反污染成名，它擁有處理污染的設備和技術，那是一流的。杜邦敗在我們的手裡，厲害如杜邦，不斷跟我們講說他們有設備和技術。我們一聽愣住了，而且跟它一簽就是半年。後來去查資料也發現杜邦是非常有名的處理化學污染的公司，那則廣告恰恰是講處理污染的。

可是讀者一看「杜邦」二字就火冒三丈，電話馬上就打來，說要來人間雜誌社拉白布條，我們也是啼笑皆非。不過我們也覺得很安慰，因為全世界沒有一份雜誌的讀者會這樣。

《人間》要不就由一個非營利的基金會來經營，要不然就非爭取廣告不可。只是廣告部門與編輯部門應該會商出選擇廣告之原則，搞負面表列，就好辦了。這一點，《人間》沒做好。

●如何決定採訪議題？

陳：為了實踐《人間》的宗旨，編輯部設立了十幾個專欄。記者們按個人平素關心和研究，「認養」其中一至三個專欄，由他們平常的生活中收集資料，自己建立檔案，一旦成熟，就提到編輯月會上做報告，經由集體討論，大家會熱心地「捐東西」、提提意見給他。內容夠豐富了，接著擬採訪計畫。

每次的編輯會議，我會聽，大家也都聽。像「湯英伸事件」是有一回會快開完時，才有人提出來。那時候，受報紙影響，我們以為湯英伸是壞孩子，但是他怎麼變壞的，是以我們

要去看他的家庭，看他的部落、他聖堂的神父、師範學校的同學。套一句《New York Times》的臭屁話，我們不做桃色新聞、凶殺案，假設要做，一定是為了事件中背後的社會學意義（sociology）。再來，為何我們也採訪苦主呢？不是平衡報導，因為我們不知不覺間太同情湯英伸了，但是苦主死了那麼多人，也是受害者，也要聽他們的話。

我想，如果說這份雜誌有什麼好，不是因為編得好，而是文章內容中真實的東西好，是從具體生活和人的現場來的影響，這個才是力量，誰很會策劃、誰很會改稿之類的都是其次。

●為什麼《人間》較少碰觸譬如同性戀、女性之類的議題？

陳：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威權國家為主導，讓資本肆無忌憚地積聚，最後破壞了生態環境、人、文化。驚人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完全沒有看到這些問題。

《人間》最有名的第二十六期，跟《天下》雜誌對著幹。《天下》認為，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因為有優秀的中產階級，有勤勞的人民，加上好長官制定開明的政策，以及牧養良好的資本家。可是，《人間》卻以不同的觀點來述說同樣一段時期的故事。她談鄉土文學論戰，她談白色恐怖，這些事實應該都要算進去，不是跟台灣的發展毫無瓜葛的。白色恐怖離開道德，事實上是政治和社會的層面，是白色恐怖讓外資可以毫無抵抗地來到台灣，是白色恐怖以後的政治架構，使得資本可以在台灣累積。然後，要為這個付出多少代價，則是我們要問的。為了這個，付出的不只是自然生態而已，還有少數民族文化的滅絕，是人心的變化，人與人的疏離。

上文續接第十版



下文續接第九版

是以，我們在1985 - 1989四年間，忙著清理台灣戰後資本主義開展過程中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實際上，我們做過有關難民、亞洲來台新娘、外籍女傭這些女性議題，也做過青少年同性戀問題。

如果《人間》今天還在，肯定會做女性的東西，肯定跟現在大家談女性的方式不一樣，我們不會只跟先進國家白種人資產階級女性的性別論爭舌，而是深入台灣生活和歷史中的女性去取材；同性戀議題也一樣，不會照抄歐美的、白種人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基督教文化的同性戀論，而是在台灣生活的脈絡中，特別協助同性戀與他們周遭社會間相互的了解，度過個人和家庭的危機。

●決定一個報導對象，編輯部是如何進行的？

陳：記者要每天從報導、雜誌、電視、廣播中注意屬於自己負責的題材，以剪報、剪貼、筆記方式入檔。他也得為相關題材跑圖書館、跑學者專家的辦公室、跑書店。從採訪現場，或從讀者中，也會提供新的題材。一直等到題材材料豐富了，提到編輯會議討論，才定案。我們有個 policy 是不能把採訪對象當作工具，完事就再見。視人家永遠低下，自己則是偉大的記錄攝影家。我們尊重受訪對象，同人家真心交朋友。記者的報導出來後，當期一定要寄給對象，送照片給人，再重要的最好想起來就去看看，關心別人的生活。如果恰巧經過別人的家，一定登門拜訪，拎個小東西，就算是幾個饅頭也沒關係。如果你報導完就扔掉關係，把人家的悲慘當做名記者的墊腳石，這樣子沒有意思，太可怕了。

●人文關懷的實踐是難的，必須投入時間、心力、熱情，不知當年的工作夥伴是如何完成報導工作的？

陳：動力不是來自個人自己的熱情、關懷

、愛心之類的。相反的，是現場，是現場的生活和入使記者成長，使記者受了教育。

時常，年輕的夥伴被邀請到被報導者家裡住，我們就會叫他們千萬不能害羞，就大著膽子，每天晚上拎米酒上門去喝，去聞他們家的味道是香還是臭。剛開始，要幫他們拍照時，他們會正襟危坐，說等下去換個正式衣服，你心裡會想這下完了，這個照片怎麼用啊，但是還是要給他拍。相處久了，他根本不在乎你拿起照相機，於是好照片就出來了。

這是訓練如何去取得人跟人之間的信賴，所以我們逐漸逐漸了解到，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當中，一批一批的人被當作甘蔗渣似地被甩掉。

看到這種事，年輕的記者有時激動得很，你必須讓他安靜。李文吉有一次做老兵，一個老兵的老婆跑了，又找回來，之後又跑，老先生最後乾脆就隨他去。那個老兵說了一句話：「我就不相信男人的胳膊帶不出好子孫！」意思是說，小孩現在沒母親，他要自己帶。我想這是再有創造力的作者，就算抽掉一包新樂園也想不到東西。

這些卑微的人，沒有臉的人，永遠不會出現在媒體的人，他們有他們簡單的原則，卻令人五體震慄。是這些人，讓《人間》年輕的記者放棄高薪，去為生活、為意義而工作。這絕對不是說陳映真有什麼了不起，很會教，真正的教育是現場的採訪。我親眼目睹這些年輕孩子迅速地改變，文章進步很快，活潑的神情日益沈默。

他們來交稿，常是喝得醉醺醺的報在辦公室裡跟我吵，然後就掉眼淚，最後大叫我不幹了！可是我心裡知道他們是拿棍子也趕不走的。

●《人間》有沒有可能復刊？

陳：我想復刊想的很。這幾年，不斷有謠

傳《人間》要復刊，我都是最後才知道的那個人，也不知風是從哪個空穴來的。最近，我們曾認真地在考慮這件事，預算做一做，結果發現這個錢太大了，所以我說「No」復刊不可能。

要是將來《人間》有機會，我會希望培養真正有思想有見地肯吃苦 non-fiction writers，跟群眾保持活潑的聯繫的作家；其次，復刊的《人間》會以更積極的角度去說故事；第三會與大家一同思考解決的辦法，而不再是拋一個東西去說明台灣有多爛、某某問題有多嚴重，卻不提供解決。

●可否談談對您影響的書或作家。

陳：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怎麼說呢？台灣獨特的歷史使台灣沒有一個成熟的左派。我想，在這個意義上，還是左派的东西對我的影響比較大，不管是文學還是在思想上。影響很大的理由是，幾十年下來，各種流行的思潮和知識來來去去，我反躬自省，仍舊認為自己沒錯，錯的好像都是別人（笑），那就繼續堅持下去吧。

●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有點實味，但是在這個商標重於商品，本質無人問問的世代，我們想要為一些人問的是：該如何替《人間》準確無誤地定位？

陳：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定位。《人間》比較獨特的一點是，它是編輯主體，而非市場導向，它有它的想法，有它特別的角度和觀點，老實說，我也不知如何定位，「定位」是行銷學上的語言，它的獨特性和它的短命有很密切的關係。

如果一定要「定位」，或者勉強可以說《人間》是試圖透過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流通途徑漫漶出去的「另類」出版物。

歷史的鏡子

文 / 黃孫權

■如果給各位所在的世代一個名字，你們會稱呼自己什麼世代？你覺得與同世代的知識份子或是其他社會位置角色的關係為何？你如何投入自己的努力，經驗到什麼？反省到了什麼？



「世代誌異」座談會

——從〈人間〉談起

至少，我們相信歷史斷裂的比承續的多。而歷史非但在斷裂中展開，也在每個世代發明自己的發言位置中展開。

「世代誌異」活動只是開始某個斷代史的嘗試，一個文化性刊物斷裂史的連系。〈人間〉之後，後繼許多的文化性刊物開始號召多元主體的存在與貢獻，但我們並不避諱自己所屬階級的世代中，有許多受到〈人間〉的啟發，或者接續而來的〈自立早報副刊〉、〈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所提供的文化社位置的想像，所以反而理理頭緒，從〈人間〉開始，但並不結束於人間，然後希望藉此反省文化刊物真正的地位與能量。

我們並不想為每個世代尋找「自畫像」，因為那是世代間相互取暖得來的社會位置分佈圖。雖然透過自我命名／發聲的過程裡，每個世代得以知道自己的屬性，得以行動，但更希望看到「鏡中自我」，而鏡中自我唯有透過世代差異得以彰顯，露出原形。這是我們舉辦座談的企圖。

發言者：陳映真（人間雜誌總編輯）

傅大為（清大社人所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起人之一）

王浩威（〈島嶼邊緣〉社長）

洪凌

紀大偉

主持人：蔣慧仙

主辦單位：破週報

時間地點：十二月十日，台灣溫克

文字整理／編輯部

陳映真、傅大為、王浩威、洪凌、紀大偉。望藉此反省文化刊物真正的地位與能量。與會人士有▲破週報在台灣溫克舉辦「世代誌異」座談會，希



人間
十年



陳映真： 歷史偶然的遭遇

人間在1989秋天停刊。停刊時，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裡，每個禮拜都有新刊物誕生，也有許多刊物辦喪事。停刊後，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這大概是我人生最難忘的一段經驗，有許多來信顯得比我還悲觀，說：「陳先生別難過，這個社會太爛了，不配讀〈人間〉，死好了」，反而我自己必須寫信去安慰他們。也有許多人安慰我，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客氣話，就好像辦喪事別人總要慰勉幾句般。沒有料到的是，在事後的許多年，有人不斷提起〈人間〉復刊，向我詢問，當然都是空穴來風。說這些話完全沒有得意的心情。在1960年代末期，我入獄之前，住在板橋，那時姚一葦在國立藝專教戲劇，我就近旁聽了兩年，有一句話，也不是什麼大道理，卻記憶深刻，「戲劇最重要的是演出，演出時盡力，下場後無論掌聲噓聲，都不用管，盡力準備下一場演出。」不知為什麼，這句話變成我的態度，所以〈人間〉

停刊時，我並沒有耽擱太久，〈人間〉也像一齣戲，成績如何自有人評價。

今天，我也不想一直緬懷與年輕朋友工作五年的美好時光，但是我不禁要說：外面有許多說法，都將〈人間〉的功勞歸於我，是我的影響。總編輯當然與雜誌風格有密切關係，但其實〈人間〉最不同的，是我們的觀點不同，與主流媒體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教育我們的也不是總編輯或是發行人，而是在採訪現場中，

給予我們年輕記者豐沛的感受和學習，使她們用文字和影像記錄下來。我還是蠻感謝和懷念那段時間。每個人在年輕時候，總有那麼一段時間為理想而工作，不顧慮生活現實，跟著朋友一同辦詩刊、同仁誌，總是每個年輕人幸福的回憶。我何其有幸，一生中經歷了三次，第一次是與蔚天驤辦〈文學季刊〉，我們躲在咖啡店寫稿，彼此欣賞對方寫出的好文章，像黃春明的〈鄉〉我就很欣賞；第二次是與年輕朋友辦〈夏潮〉，想不到年屆五十時，還有機會與年輕朋友辦〈人間〉長達四年之久。如果〈人間〉有一點成績，也該歸功所有參與過人間的人。

雖然我不善於談自己，但應著主辦單位非常後現代、新新人的題綱要說些話。我覺得年輕一代總是缺乏歷史的展望。我可以談談所謂的「文化工作」的歷程。我生於1937年，47年228事件發生時，我才十歲，從歷史來看，中共地下黨到台灣來才一年。49年白色恐怖開始展開，50年，我十三歲，台灣一片腥風血雨，連耳語都不敢鬆口。1957年，我二十歲，台灣主要的意識型態已經不是日據時代那套民族、民主的哲學、審美系統、社會科學的範疇，在49年到52年

全面的肅清當中，所肅清的、槍斃了或監禁了的不是幾千人而已，而是整個日據時代殖民時代的所遺留的一切意識型態的滅絕，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灣進入了不同的知識體系，1960年〈自由中國〉出現後，作為一個極端反共的學生子，其實就是右翼的自由主義，成為當時霸權性的論述。為了反共而選擇自由主義，主要思想是反蔣、反共、親美，未來要更好的反共，反蔣的原因是蔣介石的反共無效，而有利於共產主義的發展，所以最好採行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自由中國〉整套的論述，直至70年代都成為校園、知識菁英的流行意識型態。在1965年到1968年，我們組織了一個左翼的讀書會，看了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及謝聰敏和魏廷朝「自救宣言」，第一次讓我知道原來搞台灣獨立的人，不是警總在喊，而不見身影，原來台灣的有些知識份子已經付諸實踐。雖然我很感動、吃驚，但他們的言論卻說服不了我。68年以後我就入獄了，1970年雖然在獄中，對於保釣運動的消息仍然關心，在獄中我訂了胡秋原的〈中華雜誌〉（二個月後獄方不准）、台大〈中外文學〉、陶英聖的〈拾獲週刊〉。75年出獄後，沒有多久，鄉土文學論戰開始，79年不知為何原因，被監禁了36小時，12月高雄事件發生。進入80年代後，最大的變化就是海外的分離運動回到台灣後，充滿了悲憤，許多熟悉的朋友在高雄事件後改變了立場，台灣文學從此分裂了，以前的鄉土文學以「外國」作為對面轉變成為「中國」為對面的論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創辦了〈人間〉雜誌。

在這樣的社會中有一些刊物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像是〈台灣社會研究〉。因為在鄉土文學的論戰中，我總覺得有兩個缺失，第一雖然對於50年代西方的現代文學有批判力，使其喪失霸權的地位，但是鄉土文學的創作並未跟上理論的腳步，整體來說有思想性、開創性的作品並不多見，第二是在方法論上或是語言上，是庸俗的馬克斯主義，庸俗的唯物主義，固然我們可以推卸責任說當時沒有那麼多書可以看，可是比起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還是用功不足的。例如韓國，1986年盧泰愚上台時宣佈了韓國的民主化，但有位韓國的教授公開發表了韓國版的〈資本論〉，而且在序言裡自傲的說韓國版與北韓版、日本版有何不同，當時韓國的知識份子非常興奮。所以從左翼的立場來看，文學論是離不開社會論的，如果文學是民衆的文學，那麼就要問民衆是何指？台灣共產黨在28年、31年曾提出一個供運動之用的、台灣物質現實的粗糙分析之外，都未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冷戰的意識形態下，即使受過西方資本主義鮮有的反省（學生運動），都很快就落入左右的鬥爭，當時的留學生變成當今的國民黨政權的主流領導者。處在這樣動盪的歷史變局中，非我天縱英明，而是偶然地存在歷史的波動中。

從早期收集20、30年代的文學作品，無意間接觸到政治經濟學的東西，到今天年屆六十，我寧願說我自己是個藝術家。我這個年代，爬過歷史的人，無寧說國家民主過程是失敗的。特別是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左翼是挫敗的，沒有基礎，沒有實戰經驗，沒有時間發展自己的社會論，但也不能全怪歷史，可以說這是我們這代不夠用功。

刊物是知識份子的業績，現代思潮的表現，總的說起來還是我們用功不夠。我們抱在自由主義二十年，比起其他第三世界約國家知識份子的業績，我們還是不用功。



到今天年屆六十，我寧願說我自己是個藝術家。我這個年代，爬過歷史的人，無寧說國家民主過程是失敗的。特別是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左翼是挫敗的，沒有基礎，沒有實戰經驗，沒有時間發展自己的社會論，但也不能全怪歷史，可以說這是我們這代不夠用功。



現在時序進入解嚴前後，那時許多學者回國，或者開始投稿回國，引借許多國外的理論來作為解剖現實的操作性工具，像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自立早報」副刊。但是這一波的歷史，有否搭上國內的社經變化則是下一個世代的問題。像傅老師在國外曾經以林中平的筆名（大家都不知是誰）投稿自立副刊達三年之久，與自立形成一個緊密的論述戰場，現在可否請傅老師談談？

傅大為： 邊緣切禁驕傲

我還是不太清楚主辦單位「世代誌異」的意思，按照古代筆記的說法，就是主流人士將蒐集的一些奇人異事記錄下來，是所以「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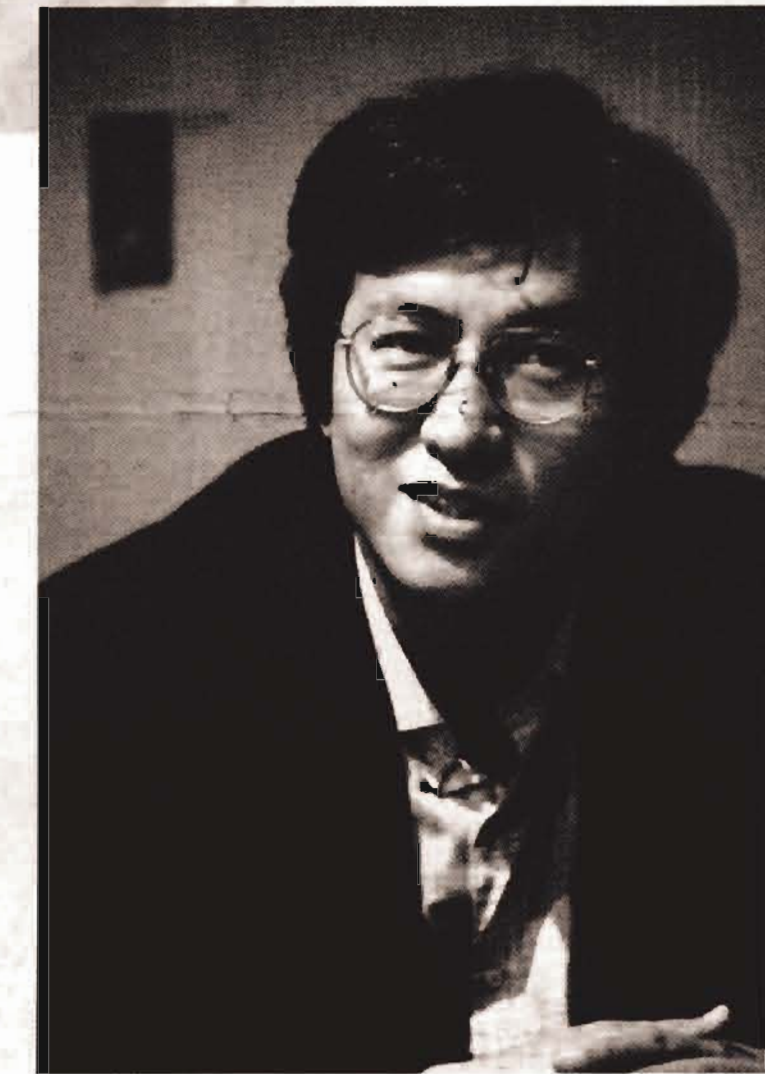
我還是來談談「邊緣寫作」的問題，我已經退出台社了，這是先聲明，至於跟〈島邊〉的關係還曖昧不明，這要看王浩威怎麼作。雖然是從〈人間〉談起，可是剛好我那時出國（77—78）年，沒有看過人間，之前我倒是看過〈夏潮〉，在美國學校當研究生時，中國時報的海外版正在發行，許多研究生剛好把所學的理论賣到報紙上，很容易消費，但有些朋友覺得，如果不是為了自己的名氣，而是為了運動，應該把精力放在海外的地下刊物上，而不是地上刊物。我那時候與一些朋友對地下刊物比較有興趣。

回台灣時，因為偶然的就與自立早報合作，林中平的筆名是回國後才用的。那時比較積極的就是籌備〈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開始並不希望把它變成左派啟蒙式的東西，希望直接從研究入手，介入學術界戰場。那時，就如陳映真先生所說的，在學院裡清流自稱的正是自由主義的學者，在學術圈外就是黨外人士的運動，這大概是那時的格局，我們因為本身也是學術界人士，所以決定了後者的路線。至於像〈台社〉的成績，自有後人評斷。我的感覺，即使〈台社〉的作法也是邊緣的，相對於當時的學術界，是個相當特殊的場域，而非一般媒體。在自立寫東西，是偶然的機會，因為那時我參加「教權會」，與其他兩位老師合作「三人行」專欄，當時在自早副刊寫東西意思很不一樣的，今天可惜顧秀賢沒來，自立副刊的許多點子都是他和劉克襄想出來的。後來〈島邊〉就出來，當時我在國外。

「邊緣」這個字，今天變成很流行的字眼了，因為字不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法。我可以就「邊緣策略」這一兩年的變化說說自己

的想法。邊緣策略在開始發展時，的確可以讓主流中心不安。因為主流中心最傳統的作法就是收編。知識份子從受教育以來，老是以憂國憂民自稱，所以中心只要把知識份子吸收進來就好了，但如果知識份子沒有進入中心，一直在邊緣批判，就會令主流顯得相當困惑。但這也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在邊緣寫作的知識份子一直會有誘惑而走向中心，其實在〈島邊〉裏的一些人在台灣文化圈中的聲望往往超過在傳統中心媒體寫作的人的聲望，所以產生一種吊詭的情況就是你要走上中心最快的方法就是走上邊緣。邊緣人進入中心後，因為抱著一種「顛覆」的目的，而我現在會儘量少用「顛覆」這兩個字，以免許多人在進入中心的時候，認為自己一方面是中心但又有一個神聖的使命是要去顛覆，但實際上做了什麼我們也不太清楚。這樣一個誘惑及問題，我個人會覺得十分的憂心，總覺得這中間出了些問題，然而我並不是那麼清楚。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邊緣中知識份子的「自我鬥爭」。在這幾年來一些邊緣的知識、文化團體往往發生一些或明或暗的鬥爭情形。「邊緣」應該是鬥爭「中心」或者是面對中心來作抗爭的，但這一年兩年的狀況卻是彼此之間沒有什麼聯盟，而鬥爭的情形很嚴重。這樣的事情並不只是聽人說說，實際的例子就發生在我工作的清華人社院，本來是從事反抗鬥爭活動的朋友突然反目成仇，而這樣的情況也不只是發生在清華而已，我實在不能理解也覺得十分難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和台灣近幾年政治局勢的改變，文化社會運動空間的縮小乃至於這種爭奪地盤的情形發生，我想這個大背景是影響的原因之一，但不全是。更進一步應該是談到所謂「邊緣策略」的問題。學清華為例，我深覺會發生這種鬥爭是在「策略」中出了問題，而我個人在思考方式、邊緣策略上也一定會有問題，只不過沒有爆發在我身上罷了。至於問題為何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今天之所以談到這些，



我是希望有機會把這個狀況更清楚的呈現出來，一方面是自我反省，一方面是給大家一個警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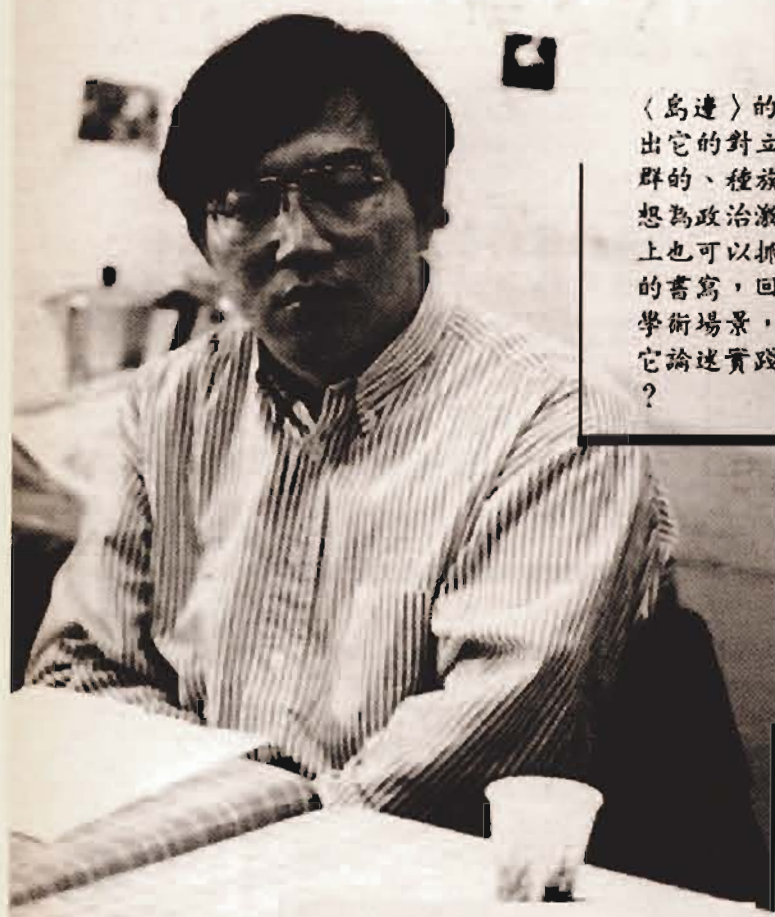
早先我們在進行所謂的邊緣政策時比較沒什麼人注意，而今天我們在做這些「邊緣策略」、「邊緣寫作」時必需特別小心，應該避免所謂的「邊緣驕傲」、「邊緣衝動」的心態。就是認為「邊緣」一定是對的，是自我證明的，隨便你愛怎麼搞都可以。但近幾年我比較不認同這樣的作法，而認真去思考「邊緣倫理」的問題。在左派傳統中是不太談這些的，而我認為「邊緣倫理」將會是一個愈來愈重要的問題。而在這裡所說的「倫理」並不只是道德之類的東西，而是相對立於「邊緣驕傲」；並不是想怎麼玩、自己玩的爽就可以的，因為這中間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問題，這也是我今天提出來與大家討論的原因。

最後我想提出一些看法來呼應陳映真先生剛才所談「用功不夠」的問題，雖然我的思考脈絡與陳先生可能並不一樣。解嚴前後到今天，

而今天我們在做這些「邊緣策略」、「邊緣寫作」時必需特別小心，應該避免所謂的「邊緣驕傲」、「邊緣衝動」的心態。就是認為「邊緣」一定是對的，是自我證明的，隨便你愛怎麼搞都可以。但近幾年我比較不認同這樣的作法，而認真去思考「邊緣倫理」的問題。

從我回國到現在約十年的時間，我看台灣的文化運動及邊緣策略、書寫的發展至今，它的邊緣效應似乎是愈來愈小了。我覺得台灣社會現在要做一些具有批判性、邊緣性的東西應該要更細緻的思考它的作法。因為台灣現在學術、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和十年前比較起來是非常不同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做邊緣的批判與挑戰就沒有像十年前那麼簡單了，如果要真正有效的批判或切入的話，是需要相當的學習、研究，而不是像佛洛伊德說的「我有壓抑所以我需要解放」，就可以挑戰、顛覆一些東西，應該是要多學多看多想，才能在台灣邁入更精緻化的統治政權時完全有效挑戰。

倒也不像陳先生所說的，我們台灣比起日本、韓國等地方是差的。就歷史的角度而言，台灣這一百多年來它的知識份子環境是相當糟的，我看以前像吳濁流那些人的情形，比起其他國家的確是差很多，但現在不至於處處不如人。



王浩威

左派暗啞不如同志

人間十年

14

〈島邊〉的編輯方針，其實每一期都可以看出它的對立面及所選擇立場代表性，例如族群的、種族的到後期性別的方面。它是以思想為政治激進來對抗各種霸權。從它的策略上也可以抓出一個主軸，也就是所謂後正文的書寫，回頭看〈島邊〉所引入的後現代的學術場景，對台灣知識界的影響為何？以及它論述實踐的策略對底鬆動多少主流的霸權？

島嶼邊緣



上次〈島邊〉內部會議，本來也想討論上述的問題，問問台灣社會今天怎麼樣了？島邊可以攻佔什麼位置？後來因為又想到錢、想到稿子從何來，又忙，就散掉了。左派也是，一忙就散掉了。

個人的經驗而言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參與了許多異議團體。在我讀大學年代，在一九七九年剛好遇到了美麗島事件。在那個時候對於政治還是朦朧懵懂，而在高雄，覺醒會比北部大學慢。那時最活躍的就是醫學院了，雖然我是醫學院的，但我當時並沒積極的參與政治運動。幾經輾轉，我認識了陳映真先生，有點熟又不大熟的那種。由於常去台北，對於不知道的地方、社團都跑去看看，也知道許多好玩的事。後來我也參加了一些刊物像早期〈春風〉的詩刊、〈海峽〉的編輯、顧秀賢的〈戰爭機器〉的專欄一直到現在的〈島嶼邊緣〉。後兩者是真正進入核心去運作的。

比較不同的是，陳映真先生是對台灣的一個總體的分析，像是我們在〈春風〉或〈海峽〉的時候一樣，其中所隱喻的，就是現在主流講的是一套，但還有一套所謂「真的主流」存在。而到了傅大為的時候，相對於中心的邊緣就變成了是一個可能一直不斷生產、自我維持的情形，含有「革命無望論」的意味，如何另起爐灶不斷在邊緣戰鬥，這是比找尋一個真的中心更重要的。

由於年紀比陳、傅兩位先生小，也可能「用功不夠」吧，所以如何面文化策略中的一些問題也是我相當困惑的。暫時跳過這些回到歷史脈絡中來談，當時在〈春風〉時期，鄉土文學論戰已經是成定局，也就是論戰本身雖然勝利了，但像陳映真所提到創作和理論的深度都有了問題，並未解決。可以看出寫實的現代詩已經到末期了。好玩的是當這樣的論戰成了定局時，運動和創作的力量會愈來愈薄弱。到〈海峽〉的時候有了一些新的力量進來。但是正值戒嚴時期，每個人的行動都是很小翼翼不敢亂來的，大家的身份是隱身的，還處於一個「秘密組織」的時期，誰也不知道這刊物是誰在出錢印給誰看，對於許多問題例如統獨等也沒得討論沒得溝通，所以整個編輯部的士氣相當低落，人也紛紛離開，最後剩下我和吳振實。而到最後所演變的已經不只是左或統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意氣之爭。現在在唐山看到小本的〈海峽〉，我會感到有點難過，因為裏面其實會出現右派的思想。

我想那是因為彼此之間缺少對話的機會的原故。所以人也不斷的流失，而今天能有這樣的機會對話我覺得很好。

採訪／蔣慧仙

顧秀賢：

告別自立，發起寫書運動之必要

「那是一個文化抗暴的年代。」前自立副刊主編顧秀賢回憶，「自立副刊要做的事其實簡單來說只有兩件——一是對抗國民黨的政治與文化暴力，二是對抗主流媒體的暴力。」

顧秀賢所主編的自立副刊，在解嚴前後直至九四

年，對於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發揮極深刻的知識傳遞與記錄功能。在絕大多數當代副刊都是軟性文藝調子的走向中，自立無疑是秀異的。

「當出自立的作法也可以說就是看出人間雜誌的侷限，而嘗試走出不同的可能性。」他說。自立是以英國霍爾威士

的文化研究取向為模式，希望開闢出文化評論的公共場域。七八年的實踐下來，自立早期成為新左與歐陸批判思想的試驗場，後馬、新左、女性主義、心理分析理論等，紛紛登場，相當豐富了臺灣面對本土文化情境所需的理論分析工具。

(下文接第十五)版

這樣的陰影到現在也一直存在，而我這樣說是因為在台灣同性戀運動有所謂的 COMING OUT，但是為什麼台灣的左派沒有這個過程，在台面上會承認或是積極說自己是左派的大概只有陳映真先生。其餘大概也只是非常零散的。就像「紅燈左轉」這本刊物，本身搞工運的人可能也會因為本身右派的思想而被學生批。左派的人到底在那？台灣的左派歷史到底那？剛才傅大為提到所謂內鬥或吵架的問題，我會比較鄉愿一點的認為吵架似乎是左派的天性。只是如何才能把這個情形改善。

談到〈島嶼邊緣〉的出現是在〈南方〉等一些雜誌快要消失的時候，也是「新馬」、「新左」、「結構主義」進來的時候。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同時也是知識上的斷層。也因此我們才想到應該要多讀書，因為有不一樣的知識背景才能解決問題。經由不同的知識工具激盪出對台灣社會不滿的策略，所以才會有像「戰爭機器」的專欄出現。因為寫久了所以就會有各路英雄來找你聯盟，我覺得顧秀賢他能將海內外這樣的一群人聯合起來，（透過這樣的情形我才認識了傅大為、馮建三這些人），是繼高信疆之後影響台灣文壇最深的人。經過這些歷程，有了些累積，我們才想應該要辦一份雜誌。那時最先想到的就是「新左評論」。但那時還是有些忌諱，怕被貼上標籤之後在政大、清大教書就吃不開了。所以想想還是改個名字好了。最初是想用馮建三所開的專欄名稱「邊緣島嶼」，但後來又擔心獨派的會抗議把台灣當成邊緣是不是想和大陸靠攏。最後才把它改成「島嶼邊緣」。當然這些年人員也是來來去去的。

當初所預估的成本（一年四期，一期二十萬）大該是一百萬，募款的結果有七十二萬，這些錢也是到最近才快用完，所以才想到要第二次的募款。狀況比當初想像的好很多，第一年多半還是引借性的，後來 101 條款、原住民的議題比較接近社會現實的批判。至於〈島邊〉「後正文」風格，變成〈島邊〉成名、被認可的明顯風格，這也是我在思考的問題。像陳先生提到的〈人間〉雜誌，有一群人計薪水全職全時的工作，在島邊幾乎不可能。剛開始，五六年前，這些學者剛回來閒閒沒事就提筆寫稿，現在每個人都忙得很，有學術生涯要照顧，甚至忙到連互相之間都有些疙瘩、溝通不良的情況，有一陣子〈島邊〉幾乎要停刊，主要是稿源的問題。〈島邊〉很明顯的，是誰出的勞動力比較多，就是誰的風格，關於「後正文」的風格，其實有只有三、四個人比較熟悉寫法，但是慢慢地變成島邊的風格，好的方面是接上時代精神反應不錯，但有些人就漸漸疏遠了（特別當初夢想是新左派的人），左的味道就漸漸沒了。這裡很難評斷對錯，重要的是，如何對社會現實做好分析。上次〈島邊〉內部會議，本來也想討論上述的問題，問問台灣社會今天怎麼樣了？島邊可以攻佔什麼位置？後來因為又想到錢、想到稿子從何來，又忙，就散掉了。左派也是，一忙就散掉了。



「文人新」是「新島早報」的一個專欄，由「新島早報」的編輯部負責。本專欄的宗旨是：「以文壇為中心，以文壇為對象，以文壇為目的。」本專欄的內容包括：文壇動態、文壇評論、文壇專訪、文壇小說、文壇詩歌、文壇戲劇、文壇攝影、文壇漫畫、文壇圖畫、文壇音樂、文壇舞蹈、文壇體育、文壇其他等。本專欄的內容豐富多采，是文壇愛好者不可錯過的精彩節目。

「新島早報」的編輯部，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團隊。他們不僅負責本報的編輯工作，還負責「文人新」專欄的內容。他們對文壇有著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接觸，能夠為讀者提供最新、最權威的文壇資訊。他們的工作是艱辛的，但他們對文壇的熱愛和對工作的責任感，讓他們一直堅持下來。他們希望通過「文人新」專欄，為文壇愛好者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促進文壇的發展和繁榮。

期間對於後蔣時期臺灣的政治社會型構轉化的分析、學運世代與人民民主實踐、台灣新電影的論戰、以政治經濟學解構國家建制與政策、乃至後期對於國族主義論述的拆解等等，都展現了相當論述火力。不論就臺灣新左知識分子的集結，以及外來理論所陸續遭逢的在地挑戰，自立副刊都是一部極其重要的知識史。

九四年自立換報老闆之後，顧秀賢也離開報社回到東部沉潛休息。雖然自謙是「離開了文化戰場」

，但對於臺灣當下情境的批判仍然充滿火力。他說，反省當初自立所經營的文化批評雖然開拓出一定的空間，但是並沒有真的構建出文化評論的傳統，許多辯論因而成為電光火花，或者流於參雜情緒的論戰，未能持續深化，「我認為臺灣應該發起一個『寫書運動』，大家好好地靜下來把觀察寫出來，這樣要互相攻擊與辯論才有所本。」

「再者，臺灣已經從文化抗暴進入了文化協商

年代，不再是期待政論性雜誌或言論的介入。關注的眼光要移往影劇、婦女、生活消費性的版面，介入日常生活的分析。與其做教條化的批判還不如不批判，先做生活情境的全面記錄更重要。」顧秀賢說，「破週報如果在方法論上沒有強烈自覺，沒有超越自立、原地踏步就等於是退步。」他希望破不指標榜代間差異、更要拉開廣闊的反省批判的戰場連線，介入當代的文化政治。

洪凌：

既有權力架構失落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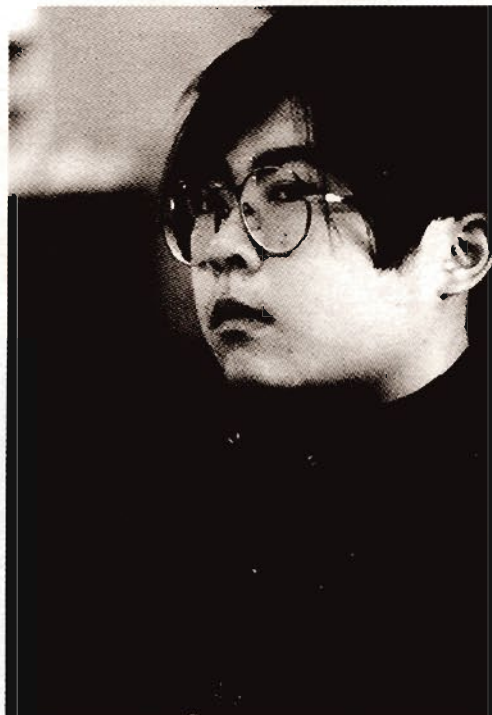
昨天晚上我被臨時召喚，現在我知道原因，一來可能是生理上的女性，二來也是論述脈軸上，是按照年齡來，所以我還是搶在紀大偉前發言。現在發言壓力很大，聽前面說完以後，覺得有鄉愁是件很棒的事，有集體記憶與歷史感多好，說實在的，我也被感動，也想有。但是「有」又能怎樣，或者被建構，或者被「有」出來的快感與刻骨銘心感覺又如何？現在我處的世代是個超額現實（hyperreality）的年代，反而對於現實有種恐懼或逾越或焦慮。我大概不可能是右派，可是王浩威的感慨有所指，我必須有所回應。我（所謂冷酷寫作）與媒體的關係是欲拒還迎，媒體覺得有趣，但不會放在同等的位置，就如同現在有許多稱呼「新新人類」的人，會說我們的閱讀、寫作是如何的不一樣，舊人類簡直落後，但在這樣的講訴中，這難

道不是對既有權力架構失落的恐慌嗎？這點都無法反省到，這樣的仍存優勢位置的反省是不足的。

新新人類容易被上一輩的人嘖嘖稱奇，被「齊齊化」，在歷史中極欲定位新新人類，這點可以從我與紀大偉與島邊合作的關係看出。在第九期「女人國」之前，我們都是忠實的讀者，在1993年台大小劇場演出「愛德華二世」，王浩威好像捐了1000元，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接觸。後來我寫了一篇「愛德華二世」的評論，也刊在島邊。後來我們到島邊開會，把想要入侵的題材提出企畫，這是第二次接觸。然後有些愛恨情愁諸如此類的東西。光談世代是不夠的，階級、種族、世代、甚至情慾快感都不一樣，就一個島邊的編委來說，提供我不少刺激。

前輩們的談話都很有反省性，但說我很想知道底線在哪？除了對於種族的特定關切外，像性別、情慾在前代的歷史裡都未出現，我很想問左派的底線在哪？是否還是有革命優先論的看法，什麼東西要首先解決？什麼要次要？至於後正文的寫作效果問題，還是要讓讀者回答。

我記得有一年聯合文學破天荒地（1985年）舉辦「同性戀文學」座談會，一位有名的歷史小說家高橋說：「在歷史裡，女性獨守空閨是很可憐的，即使姑嫂相親也不為過，但是下賤的優伶男性相親，簡直污穢不堪。」那時是1985年，現在如果還有人在會議上說這樣的事情，我們有很大的正當性可以反駁。在1995年出現的同志論述、情慾論述，至少在台面上，可以被「小心」的對待。



換，而前面的叔叔、伯伯、兄長型的人物，到我這邊變成孽子、荒人、酷兒等敗家子形象的出現；對我和同輩的人而言，歷史是沒有人要相信的，是供給上面人的東西，所謂上面人是依年歲和歷史來界定的前輩，而後面的人真要做出一一些名堂的話，是另一種形式的運動，這也難怪以前的人來看我們現在的行動策略會說出向「今非昔比」之類的話。

以一個文學創作者的身份來說，就常有人質疑我為什麼在主流出版社出書、在大報上發表文字、為什麼不把一些像是「新新人類」等大標籤抖掉，或者說談同性戀問題是為了要營造新霸權，其實這些質問是不公平的，因為我認為時到今日是不是有所謂地下或另類的東西可以令人相信，是不是我們制訂的一些東西就一定能擺脫非常惡質的物質狀況和意識型態，是不是在中國時報或聯合報上寫一些同性戀亂倫的問題就是被收編、就是沒有革命意涵，在學院裡搞怪是不是就不夠基進、一定要到非學院的民間，我覺得不能完全拿八零年代和九零年代作類比。

再回到剛剛說的歷史，我現在比較願意相信的是一種非歷史性的歷史，不是以五零、六零、七零等年代進展來界定的歷史，而是一種同時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狀態，而不是那麼去強調傳承，可以說是一

種斷裂。舉例來說，中時開卷版的記者在描寫二、三十歲的年青作家如我、洪凌、陳雪時就會曾經疑惑的表示，為什麼這些人的價值觀這麼的怪異、筆調這麼地戲謔不夠嚴肅，甚至舉了駱以軍的正面例子來相映襯，說駱以軍的作品裡人物都非常認真、情感都非常沈重，不像洪凌、紀大偉她們動不動就寫亂倫、同性戀等等毫無生殖意義的東西；其實可以發現的是在這個強調同時性的時代裡，還是有一些握有發言權的人，會抓住一些似乎較有正當性的東西，拿它們當作圭臬。以前的創作者或批評者沒有這種觀念，而現在這些性別議題或同性戀議題進來的時候，其實讓很多人的世界觀為之改變，非常可惜的是這股強大的政治推動力卻不見得被人承認。

今天座談的主題「世代詭異」的「異」字應該被好好的思考，在一些文學新人獎的比賽中有越來越多女性主義、同志論述的東西出現，但是有些文學獎的評審卻不斷地努力撲火，譬如像張大春等人就會覺得為什麼不斷有這樣的妖孽出來，是不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價值觀錯亂；有趣的是，以前當左派、新馬等思想風行時，卻沒有人那麼輕蔑地說那是一種時髦，而對於今天的女性議題、同性戀議題就會，這之間的價值觀落差非常有趣，可供大家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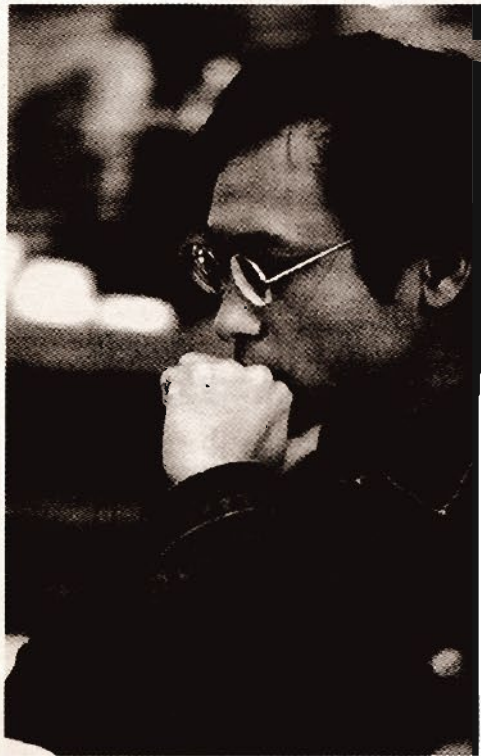
續文接第二十七版

紀大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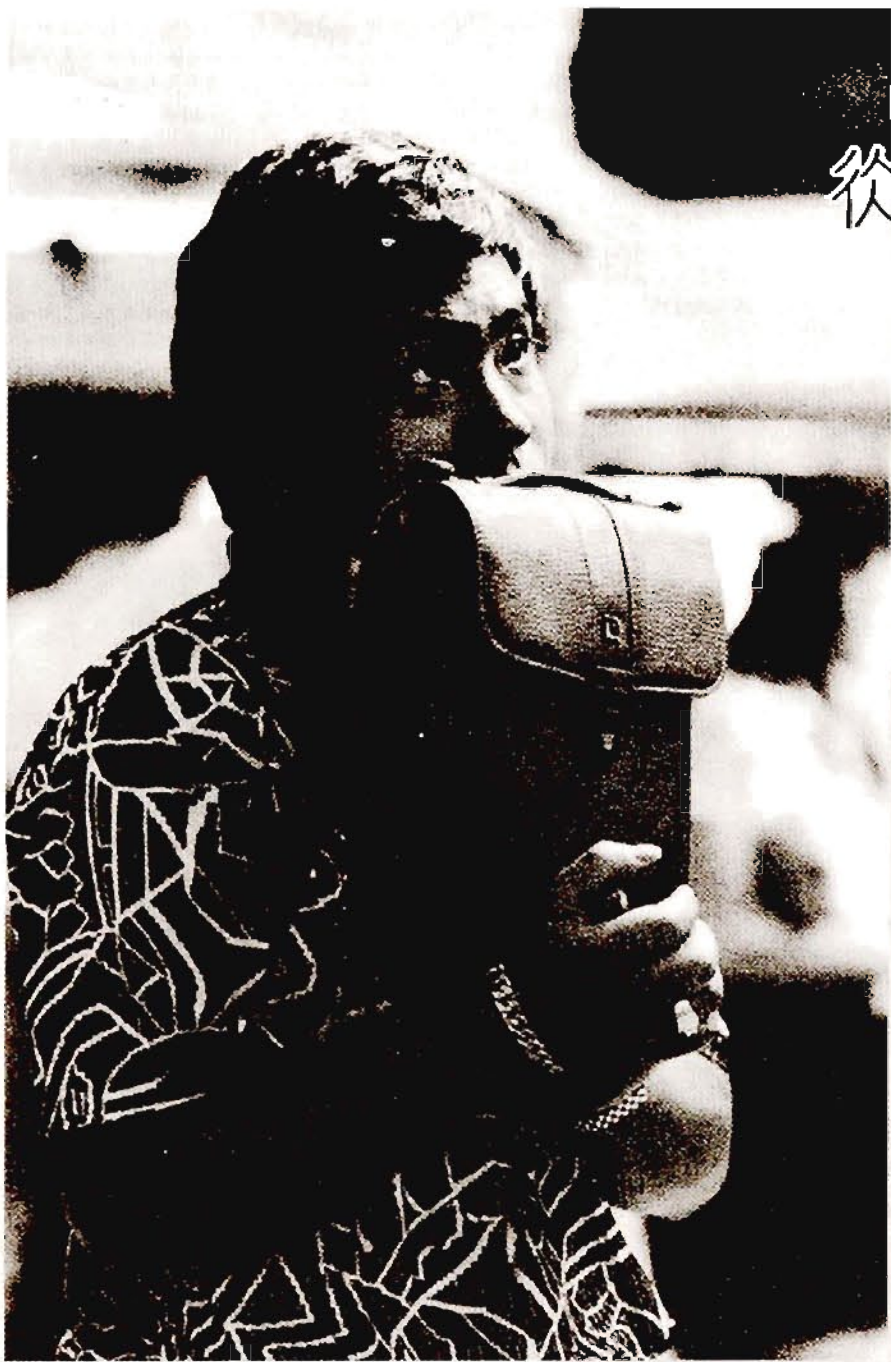
歷史像牛排一樣厚重

洪凌之前的發言都非常的太塊，像牛排或麵包一樣的厚重，這再一次地提醒我在這歷史中，若要談歷史性的歷史，我只是一個接受者，像「零號」一樣的接受者或是像個學生一樣乖乖聽話；而我的發言會比較虎頭蛇尾，這不僅是為自己脫罪其實也是現實描寫。

前面幾位的發言像是在告白，而我的告白像是在回溯自己的歷史，這段歷史相較於前面幾位所談的歷史真是短得太好笑了。我在一九九零年進大學，正好是中正廟學運風潮結束的時期，學運於我像是個遙遠的神話，是學長姐強加學弟妹的想像，在這種情況下，校園裡的老大姐老大哥們常感嘆「今非昔比」，要動員學弟妹上街頭也十分不容易；可是我認為這正是新的潛力要展開的徵候，而新的議題、空間的打開如女性主義、同性戀論述等等對我這和我同世代的某些人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發言到洪凌為止是性別的轉



人間十年



從相機快門 到心靈快門

——專訪張詠捷

文/林秀麗

原本是單純地拿起相機、單純地直接由內心來做觀察，到發現原來攝影也可以對社會大眾做點事、負起社會使命感，家住澎湖的張詠捷，樸實的言詞中，娓娓道出了一位來自離島的攝影工作者，在進入人間後，從按下相機的快門到按下心靈快門的心境轉折。

人間是張詠捷高中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當時，很多朋友都提醒張詠捷人間左傾的意識形態可能不太適合她，甚至有朋友猜她在人間工作一定不會超過一個星期。不過，到人間工作後，「事實證明了對人的關心並不會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有所區隔」，張詠捷說。

由於家裡開的是澎湖第一家相片快速沖洗店，相機對張詠捷而言並不陌生。不過也因為從小居住在澎湖，海島型性格讓她比較不會去留意大環境的改變對人的影響。1989年3月進入人間工作後，雖然只有短短半年多的工作經驗，人間對底層階級關注、及公害的報導，甚至人間的同仁對社會現象分析的方式，都對張詠捷產生很大的衝擊。

張詠捷開玩笑地說，當初上台北工作時，才二十歲初頭，不但連火車都不會坐，對台北的環境也不一直無法適應，直到到人間後，她才慢慢體會出自己也是社會的一份子，而生存本來就會製造垃圾，重點應是去思考如何改變環境。張詠捷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期關於「多氯聯苯十年血淚未乾」的公害報導，當到達受害者家裏，發現原來受害者早已默默承受了十年來多氯聯苯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卻沒有任何發聲的機會，尤其當受害者把身上的衣服掀起的剎那，張詠捷更深刻地感受到，社會並沒有她想像的那般單純。

人間停刊後，張詠捷到張老師月刊工作。由於刻板印象都認為張老師月刊是右傾、國民黨的刊物，很多人間同事不但非常反對她到張老師月刊工作，甚至還有同事激動地跑到張老師月刊社，想把她拉走。表面上，人間與張老師月刊好像有很大的衝突，但張詠捷覺得事實上張老師月刊對人的關懷與人間並無二樣。

剛到張老師月刊就職時，張詠捷基本上還是延續了人間所定義的一個好的攝影者應該站在社會前端的想法，所以只要有各式各樣的街頭運動，她都會

▲張詠捷近照。(圖/張詠捷提供)

忍不住跑去參與。但是漸漸地，由於張老師月刊完全由個人經驗出發，相當尊重個人經驗的工作進行方式，讓張詠捷開始思考自我的存在，用「心」講出生活的體驗。

現在回想起來，張詠捷覺得文字與攝影不同，攝影是一個很現實的、表象的呈現，很難用攝影去描述人的內心。當初張詠捷所以拿起照相機只是用一顆很單純的心來看世界，但人間則很不一樣，它是以探討事件的眼光來看社會。張老師月刊工作的經驗，倒金字塔型的互動關係，總編輯的位置剛好是在倒金字塔的最下面，不但幫張詠捷逐漸發現自我，甚至開始覺得攝影不一定要有那麼強的使命感，或是一定得為人民服務。她慢慢體會出一個人並不一定非得用相機才能發現人生，也可以用其它的方法，如塗鴉、畫畫、彫刻等方式、用心靈的眼睛來看人生。

不可否認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很多具代表性的雜誌，人間有其階段性的影響，尤其時間的輪軸一直在前進，當所有的關係都在改變，張詠捷覺得就更能感受到80年代那股強烈的土地關懷。然而身為一個記實攝影者其實是很無奈的，因為面對大環境的改變，真正可以發揮改變的力量卻很小，可是話說回來，張詠捷強調即便知道無法改變還是要做，因為不做的話改變的可能性更小。

從事攝影工作多年，張詠捷認為一個好的攝影者要記錄的是人的精神。還沒去人間工作前，張詠捷所看到的是小小的世界，到了人間後，她開始學習用大的社會架構來看社會現象，也由原本的右傾想法被拉到左傾。可是到張老師月刊工作後，張老師月刊不但把她拉到較為中立的位置，也開始讓她回溯自己個人的生活經驗，開始覺得拍照可以是一件很快樂的事，而不再沈重的感覺。

拋棄了沈重的包袱，張詠捷覺得應更加快樂的去面對攝影。在人間時她曾有感於每天騎著摩托車、背著包包在大街小巷穿梭時，看到其它人同樣也背了大包小包在大街小巷上出生入死，當時就有一個想法，覺得每個人背後大小不一的包包，其實也代表了每個人所背負的責任，可是構想提出之後，卻被人間的同仁批評為很自我、很片的面攝影家情結，以至於想做又不敢拍。不過後來到張老師月刊時，這種構想被實現了，並得到了金鼎獎。不再被強烈的使命感所壓抑，張詠捷說：她反而更能忠於生命了！

拒絕吃 鏡頭鴉片 的李文吉

文/萬蔭琳

「進入『人間』，是一堆偶然加上一堆意外！」

重新翻開了將近五十本的「人間雜誌」，發現「李文吉」這個名字從第一期就出現，與「人間」一樣堅持了四年多，而接觸過的題材從公害、老榮民、一直到兒童虐待等，若說向「人間致敬」而不提到他，的確像少了什麼東西。

念東海外文時，大一時的一門課「中國近代小說」，讀的都是些禁書，從五四開始讀，一直到陳映真的「將軍族」，那時他才知道有這麼多寫過這些書。後來也有請陳映真來演講，講當時轟轟烈烈的「鄉土文學論戰」，所以對陳映真的印象很深刻。

畢業後，大約是民國七十年，他在學長的介紹下，進入陳映真當時的傳播公司工作，主要是編一本醫學刊物，當時採訪範圍不只是在農業或醫學範圍，到處跑了跑，也因此對都會以外的地方有些瞭解。

七十三年，陳映真要自己弄一本雜誌，六月開始籌備，直到隔年十一月創刊。「那一年中，陳映真沒有指定什麼題材，都是自己去拍，自己去拍。也算是在那一段時間才開始真正接觸攝影。」李文吉表示，雖然大多是自己寫自己拍，但是他主要是不斷思考如何以影像來報導事實，「那時一直在摸索攝影的語言是什麼？要如何表達？攝影的結構又有哪些可能性？」

外文系畢業的他，原本對於台灣政治經濟學沒什麼概念，每次出發採訪之前，陳映真會跟大家做一些想法的溝通，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到現場之後，鋪天蓋地而來的震撼。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個題目「洲後村」，做的是二重疏洪道拆遷的問題，前後做了一年。「那裡是我小時會去玩的地方，我的阿媽是在那兒出生，本來是要做五股河的沼澤生態，結果六月三日那天去，剛好淹大水，整個村子都被大水泡著，我帶著照相機去，一推人就圍了上來，以為我是中國時報或聯合報的記者，囁嚅嚅拉講了一大堆，拼命訴苦，我聽了一腦袋回去，和陳映真討論之後，就決定作這一群人的故事……。」他當時只是很素地覺得，這些人連根被拔起是很悲慘的。

此後接觸的是一些小人物，如第二期的「我的朋友范澤開」，這些題材對他而言，是把焦點從比較大的事件放回人物身上，仔細去聽他們述說在社會變動中的經歷，那是他第一次去聽人們講故事。後來有次作「兒童虐待」的題目，這是第一次需要研究調查的，跑遍了全台灣的婦幼機構，寫了將近一萬字，甚至還引起一些回響，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寫作可以有這樣的功能。

「以報導攝影而言，『人間』發生的影響力不能說是絕後，但一定是空前的，」李文吉說，「對之前的台灣攝影師而言，作品就是他們的目的，而攝影原本的紀錄功能，無法發揮出來。所以『人間』一出來，帶給攝影圈、攝影記者、或是學生很大的震撼是：原來照片是可以這樣貼近人們的生活。『人間』的攝影，讓讀者直接進入被攝者的生活，而不是一幅『作品』，人在生活化的環境中被拍下來，他們的面目、感情世界出現在完整的報導裡，這和單幅相片所能傳達的是完全不同的張力。他稱許著：『做的最好的算是關曉榮，每個題目就是半年、一年，深入到如某個人的手指被漁船絞網的機器絞斷了，那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躲都躲不掉的。』

最重要的是，閱讀「人間」時，你不會感受到攝影者的存在，你不會看到攝影者在玩鏡頭、玩光圈，這到現在仍是台灣攝影界一種吃鴉片的習慣——玩器材，用器材去玩風格、用風格代表藝術。個人主義的東西在「人間」的攝影中很少看到。『我覺得最重要得東西是跟那些人的直接的相處，而在傳播的意義上，『人間』是有走出這一步來。』他謙虛地表示。其實這樣的攝影報導在全世界的報導的歷史上可說是很普遍，而且很正統的東西，不管是在富裕的美國，或是四○年代的東歐，都是非常普遍的存



▲對於人物精準的掌握，是《人間》攝影的特色之一。(圖/李文吉提供)

在，唯獨在台灣沒有。

有人說，王信對「人間」的攝影影響很大，他覺得王信的影響比較在專業技巧上：「他對我們照片的品質要求很嚴格，當然他也曾經給我不錯的建議，如怎樣抓住每個人比較深情的部份，在面對老兵的時候，他建議可以去拍一些父親替孩子蓋被的畫面，我原本是想表現『人是在歷史大河中滾動的小石子……』這樣的觀念，而忽略了個人在生活中真實的一面，照片若是沒有深入到他生活的空間中，就無法深入他們的內心，只跟一般的業餘者一樣。陳映真會說，『只有讓被你報導的人鮮活地在鏡頭中出現，那個人才不會只是顆棋子；只有被攝者活在讀者的眼睛中，印象中，他們的苦難、抗爭才會活起來，才會感動讀者！』」

第三年的時候，陳映真說要關門了，他們大夥兒都很激動，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雖然我們已經這麼窮地過了三年，但是還是有很多東西要做。到第四年時，又說要停刊，那時我們開始替大陳想，他想要做的創作為了這個刊物，又面臨財務上的壓力及人事上的對立。站在陳映真七、八年的同事的角度，贊成他去休息休息，而我們這些『老人間』也該各自去沈澱一下。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說關就關的確是蠻可惜的！現在說要再復刊，有人要出錢怎麼樣的，但是那個氣就再也聚不起來了。」他感慨地說。

離開人間，他到「大地」雜誌漸漸繼續待了兩、三年，但是他認為他把攝影弄得像十九世紀的畫一樣，停留在表面的美感，而不把攝影當成感情的表達工具，覺得很無聊。在他的信念中，一直堅持攝影是為人民而服務的，即使現在拍紀錄片，仍然是同樣的想法。去年到中國時報的中時週刊，做了幾個月卻面臨縮編，朋友就把他帶去資訊中心，還是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會變懶，遲早會走人！他還是感慨：「人間」倒了之後，比較好的雜誌可說是沒有了！

未來他和朋友想做的東西，一方面是繼續深度、寫實報導的方向；一方面是想把新聞攝影的人做串聯。「新聞界比較有心的攝影記者都很像悶燒鍋，有力氣沒有地方使，每天拍一點東西，過著很零碎的生活。」他感慨，「『人間』之後，報導攝影這個領域沒有人再經營下去，我覺得在台



▲《人間》的攝影風格大體說來相當一致，多數的作品感覺上像出自一人之手。(圖/李文吉提供)

灣看到的大部份攝影，都是人類文明思考的退化，他們多半不作抽象的推演，而只是很多單純的影像，完全感官的，不去想前因後果。有錢的人玩照相機、業餘的、蜜情的、好色的，追求表象的美感，即使新的鄉土熱，亦注重的是破瓶子、爛瓦罐、老人的皺紋、小孩的笑容等，在九○年代的台灣，攝影要如何去做一種反省而不孤立於文化界之外、很怪異的存在，怎樣脫離形式化的表達，重新思考影像的意義，靈活去運用這個媒體在文化上的鬥爭，才能找到其在文化領域上的位置。」這是他不斷思索的課題。



▲張詠捷在《張老師月刊》的拼貼作品，很容易看出受到超現實大師達利的影響。(圖/張詠捷提供)

麥子不死



▲新港文教基金會促成新港老鎮的新生。圖為安親班的同學參觀消防隊。
(攝影：顏新珠)

——訪廖嘉展

文／王錦華

如 果說，八〇年代台灣勃興的社會運動，為台灣的社會改造奠基；當前的台灣社會在經歷都市化、經濟成長、政治改革的多元發展，最需要的恐怕是「新社區運動」去面對居住環境品質低落與地方文化失落等議題。

還流最近出版的《老鎮新生》與《打開新港人的相簿》，記錄著「新港」這個地區長年推動社區運動的過程；作者翔實、家常的筆調，記錄了庶民生活的喜樂與辛酸，讓人回憶起《人間》雜誌曾經帶來的溫暖與感動。原來作者就是曾在《人間》從事報導文學與攝影的廖嘉展、顏新珠夫婦。

民國 75 年，大學畢業剛剛退伍的廖嘉展，在高信疆老師號召下，進入《人間》雜誌，還把自己當時在《天下》雜誌任職攝影的女友顏新珠一塊拉進來，同時從事報導文學和攝影的工作。他的第一篇採訪報導「豬師父阿旭」，報導自己在大學時代就熟識的盲眼豬師父阿旭的故事；阿旭的樂觀、開朗、旺盛的生命力，感染到閱讀到他生命故事的每一個人。

《人間》第十三期的創社週年特刊，廖嘉展參與「河流生命史：濁水溪」系列的製作。整個編輯部以四個月時間，12 個人的編組，三次縱走溯行了全長 178.6 公里的台灣第一大溪濁水溪。廖嘉展從濁水溪的上游一直拍攝到下游的面貌。他說：「這個採訪經驗對我影響很大。不管是由民族學、社會學的角度，整個嘉南平原這個古老的「台灣農倉」，都可以由區域的歷史來觀察台灣族群發展的變貌；我一直持續作資料整理與觀察、記



▲民國 82 年 9 月，廖嘉展舉家遷居到新港，開始《老鎮新生》的採訪工程。

錄的工作，預計在三、四年後整理出版。」

從小在農家長大的廖嘉展，看到章恩鵬風掃過雲林縣的口湖鄉，造成 27 個人死於海難，2406 公頃的農地被倒灌的海水鹹死，600 公頃的魚蝦流失，造成總計六億台幣的嚴重損失，而口湖鄉的農民正面對著無計可施的貧困，便在《人間》第十五期完成「劫後的口湖鄉」一文，報導水利會抗爭事件及農民、漁民的弱勢處境。廖嘉展說：「在《人間》大多數沈重悲苦的採訪報導中，我的作品可能是比較溫暖和帶有希望的。我總希望人們能經由對不同生命的體認，勾起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欣賞，和深刻的容忍。」

除此之外，廖嘉展印象最深的是

76 年的「殘障人權系列」：別讓這孩子失去希望」有關白化症者處境的採訪報導。廖嘉展回憶說：「這個題材是已經去世的王菲林南下採訪時發現的，由於事件中的主角朱勝賢住在高雄縣阿蓮鄉，就在我太太故鄉路竹的臨鄉，於是我們倆就自告奮勇南下採訪。」這篇報導白化症者朱勝賢因為農會代表的女兒擠入供銷部，因而以「先天性勢力障礙」為由將他無理解顧的事件，吸引了當時年僅二十七歲正在拍電影的吳乙峰의 注意。

隔年，吳乙峰就離開了電影界，創立「全景映像工作室」，籌劃將《人間》報導過的那些有著極強生命力的人物，透過影像記錄下來；這其中又以「月亮的小孩」這部探討白化症者歧視問題的紀錄片，耗時最長，影響深遠。七十九年四月，這部紀錄片製作完成後，卻因為拍得太「真實」，而被電視台「封殺」，吳乙峰只好揹著拷貝走遍全國各鄉鎮一百多個學校、社區、圖書館，一次次第舉行試片、座談會，才引起文化界及媒體的重視與廣泛討論。廖嘉展說：「吳乙峰能將它拍成紀錄片真是太好了！如此一來，作品的生命不但延伸開來，影響的範圍也更大了。」

離開《人間》後，民國 81 年廖嘉展到了素以推動社區發展聞名的「新港文教基金會」擔任執行長的工作，直到今年才離開。廖嘉展說：「整個台灣社會的改造運動絕對要從底層做起，才是最有可能性和最有生命力的。這段參與社區工作的歷程，我看到了鄉親們由冷漠到熱情參與公共事務的轉變，這個轉變過程對人是最

大的試煉。在《人間》的最後那段時間，自己實在是面臨無力撼動社會結構，改變不公不義的無力感，而作者的無奈與疲憊連帶牽動了讀者的疲憊。新港從民國 76 年，幾乎是和《人間》同時期，就有一批有心的人在做，我在這裡看到了不同生命的開展，看到了如何將不可能變成可能。」這段廖嘉展和顏新珠與新港共同生活成長的記憶，收錄成《老鎮新生》、《打開新港人的像簿》兩本集子，書中感人的熱情與協力共事的經驗，成為有志新社區運動的人分享和深思的泉源。

現在定居埔里的廖嘉展和顏新珠，仍然致力於田野調查與記錄民間影像的工作。明年做完礁溪林姓家族史的記錄工作，他將繼續完成念茲在茲的「濁水溪系列」的採訪報導。走過《人間》，當年的理想不死，仍然落實民間。



▲《月亮的小孩》系列作品是廖嘉展在《人間》雜誌的重要作品，後來曾拍成紀錄片，影響深遠。(攝影：廖嘉展)

1 985年11月，《人間》創刊，揭發了台灣社會威權統治下「和諧神話」的另一個真實面向；就在這一年，剛從大學畢業的曾淑美，發現了這樣一個特殊的戰場。「我就毛遂自薦，寄了一疊詩稿給陳映真。可是《人間》根本沒有空缺給一個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新人，我還是堅持進去作義工，是這樣我才有榮幸進《人間》的。」現任麥達廣告創意總監，廣告文案創作能手曾淑美，談起十年前進《人間》的歷史，仍滿懷敬意地說：「我以曾經身為《人間》的一份子為榮。」

就這樣不支薪地在人間作了約半年，每天貼郵票、抱著重重的雜誌，穿過那條濃蔭密佈的大街到郵局，填寫一大串的掛號名單。忽然有一天，被曾媽媽知道了，原來自己的女兒每天準時出門是去到《人間》當「小妹」，怎麼畢業半年還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兩人因此大吵了一架。結果——曾淑美口中「非常有生命力、非常可愛」的曾媽媽，翻箱倒櫃地找出她從國小到大學所有跟寫作有關的獎狀，抱著一大疊獎狀特地去找陳映真先生，跟他說：「我女兒可以寫東西，你要讓她寫。」沒想到陳映真對曾媽媽的勇氣和旺盛的生命力大為激賞；當時恰巧又有個跟雛妓有關的題材，想找個女孩子來處理，於是曾淑美就和鍾俊陞合作「雛妓奴隸籲天錄」，採訪報導了六個社會底層的雛妓個案。

曾淑美說：「這個經驗是我個人非常大的轉捩點。一方面，在報導文學的寫作上，這是我個人重要的起點；另一方面，在我對台灣社會的觀察上，這也是個重要的啟發。」此外，這也可以說是她的一次「震撼教育」。這次採訪經驗的震撼，除了目睹雛妓的苦難；更讓她訝異的是她們對苦難的自我修復的能力。她形容：「她們就跟我的家教學生年紀差不多，一樣的孩子氣，一樣還是愛玩愛鬧的小女生。」為了對應那群女孩的真實生命情狀，她大膽採用一般報導文學處理這類題材時較少使用的活潑語調。

從對詩的喜好到接觸「報導文學」這樣一種文體，曾淑美說：「一篇很棒的報導發展到極至的時候，自然會帶有文學的救贖性格；可是若是硬要將報導與文學結合在一起，那是很尷尬的。我們都要小心用文學的煽情來虛構或支撐報導，報導文學墮落成這樣的時候，就成了



那美好的仗， 她也打過

——專訪曾淑美

文／王錦華



一種虛偽的文體。」

在雛妓議題外，她的「禁忌的告白」、「人間都市女性系列」都處理了《人間》較少觸及的性別議題。她說：「也許是我個性的關係罷！我比較喜歡處理小人物、小題材。偉大的題材對我來說太抽象，自有偉大的人去處理。」

我想我的男同事們基本上認同《人間》應處理這些題材，他們或許會覺得這就好像正餐後的可愛點心。」身為《人間》雜誌極少數的女性工作者，曾淑美憶及：「我的男性同事們經常會談論一些偉大的、抽象的東西。這些東西會讓我興奮，可是受限於我的資質，我經常會跟他們說我的不成功的戀愛，這大概會讓他們覺得我是個不大長進的小女生，這個差異是確實存在的。或許，女性經常談一些瑣碎的話題，現在回想起來，這些瑣碎的話題其

實也很可愛，就好像沙發旁的蕾絲。可是當時我沒有那樣的自信，他們也沒有那樣的理解，於是溝通上，的確會產生一些問題。」曾淑美就有一兩次和男同事大吵痛哭的經驗，但她說：「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在裡面的任何挫折對我都是恰當的。因為我無法想像我可以在任何別的地方，受到比這本雜誌更好的教導；《人間》對我的生命觀、工作觀的養成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直喜好文字創作，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個「詩人」的曾淑美，在離開《人間》後，就進了「意識型態廣告公司」。她覺得：「兩家公司都是很棒的地方，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純種馬，從一個漂亮的牧場跑到另一個漂亮的牧場。『純種馬』的意思是說——我很幸運，我待過的地方都很純粹。人間基本上是同質性蠻高的地方，意識型態也是。」然而，許多人都很好奇曾在《人間》那麼一個強調社會主義理想的地方待過的人，要如何在強調為資本服務的廣告公司生存？

曾淑美自己的看法是：「我做廣告工作後，更覺得台灣的中下階層是那樣的被忽略。我們所設想的一切美學，完全是針對有能力來消費、來買我東西的人，這是很可怕的對待關係。《人間》曾用整本雜誌的力量專心致力地發掘中下階級的

問題，光這一點，我就覺得《人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會不朽。」她舉最近讀的《影像的追尋》這一本書為例，她發現每個年代的攝影家或多或少都會記錄到原住民的影像。在早期的影像世界中，台灣原住民曾是那麼一個有自信的民族，自然地煥發著他們快樂，他們的尊嚴；但愈到現代，原住民的形象卻全都那麼悲戚、那麼萎靡，這樣強烈的對比讓她傷心，她說：「這一定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出了問題，一定是我們漢人社會對他們作了過多的剝削，對我來說，這就是如此直接、素樸的感覺。所以我做廣告工作後，就會想拍原住民的題材，就像我們作『開喜綠茶』特地跑到山地部落去拍；結果雖然被蔡其達說成是一種『剝削』，但我只是想要在廣告的領域裡真實自然地呈現原住民獨特的生活美學，人們如果不能欣賞、認同一個民族的美學，就不可能真正去尊敬、去愛這個民族。」

仍帶有《人間》正義感的曾淑美，打算攻略笑鬧綜藝、誇張背喜劇後的幾秒鐘空檔，她說：「真實地去呈現原住民健康自信的那一面，這是我覺得我可以作的。我會盡量在我的廣告裡面作，我要強迫大家看到，我不管，我就是要大家看到原住民很棒的樣子，我的這個教養是從《人間》來的。」



▲「開喜綠茶」特地跑到山地部落去拍，曾淑美希望能在廣告的領域裡，真實自然地呈現原住民獨特的生活美學。（曾淑美提供）



▲濁水溪的採訪令官鴻志印象深刻。

(圖/李文吉提供)

用底層的聲音

煮一鍋的好粥

——專訪官鴻志

文/林秀麗

？後來官鴻志覺得唯一的可能應該就是桌上的那盞燈泡了一原來是被「燈泡」曬傷的！另外，第11期由官鴻志所提出的「河流生命史：濁水溪」專輯，當時溯溪而上，溪水淹及腰身的情景，甚至連作夢都在想濁水溪的第一滴水是如何冒出來的心情，更叫官鴻志永生難忘。

談到這裡，讀者可能會很好奇地問：官鴻志不是也做過「二·二八的民衆史」專輯嗎？尤其後來人間停刊後，他也延續了「二·二八民衆史」的報導方式，在新國會雜誌上發表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系列。當被問起當初為何會想要做「二·二八民衆史」專輯時，官鴻志淡淡地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不僅因為在自己周遭的人際網絡中，即有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人，也因為當高喊反一黨獨裁時，更須去解構國民黨對「二·二八」的扭曲。

放回當時長期的戒嚴體制，與媒體的一言堂式報導，從某種意義而言，《人間》不僅提供了一群反國民黨體制、既不願去公部門工作、也不太可能向主流媒體靠攏的青年一個運動的場域，更影響了這群日後對台灣的認知與看待事情的方式。官鴻志覺得人間對田野工作與到現場踏點的強調，其實暗含了一個觀念——新聞寫作的泉源應來自土壤。這樣的工作態度是相當不同於現在一般的媒體新聞工作者的。尤其當時《人間》的工作同仁都很節省（當然一方面也是為了幫陳映真省錢），不是住在受訪者家裡，就是租房子自己燒飯、煮菜，也因此常常深入受訪者的生活細節。

「是否應該有一本雜誌，不屑於刊登李登輝的臉，而只是用心於讓底層的民衆發聲？」從《人間》創刊到《人間》的停刊，官鴻志衷心的希望社會能偶而停下來，聽聽底層的小老百姓到底在想些什麼。對於多年來坊間流傳《人間》雜誌即將復刊的傳言，官鴻志提醒說應要先考慮1995年的今天，再辦一本百分之百的人間，是否有其必要？他反而建議讓年輕的一代自己來辦一本關懷本土的雜誌。

《人間》十年，餘波盪漾，或許新一代的讀者看完這期破週報後，可以好好考慮下官鴻志的建議。

翻

開《人間》雜誌，你是否曾經被關在山坎頂上的買主生與流浪漢跛腳宗仔間的情誼所深深感動？而《人間》以四個月的時間，十二個人的編組，前所未有地三次縱走溯行全長178.6公里的濁水溪，是否也令你嘖嘖稱奇？曹族少年湯英伸的死，與吳鳳神話的崩解，在痛哭流涕之餘，是否也喚起了你對原住民處境的關注？從深深感動到嘖嘖稱奇，到痛哭流涕，官鴻志正將他與土地、人民接觸時的激動化為文字，與人間的讀者共同分享！

就因為陳映真在《人間》編輯會議上的一句話：歡迎官鴻志成為《人間》的工作同仁，便開啓了官鴻志的報導文學之旅。其實，到《人間》工作之前，官鴻志不僅當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編輯，也做過《夏潮》雜誌的主編，《人間》籌備期間，官鴻志正埋首於黨外的第一本新聞周刊——《前進周刊》。在一次偶然的聚會裡，陳映真與他聊起還在籌劃中的《人間》雜誌，並力邀他到《人間》工作。由於當天話題沒聊完，兩人便相約隔天到人間的辦公室繼續談。想不到隔天一走進《人間》，陳映真很自然地就叫官鴻志加入《人間》內部的編輯會議，而官鴻志也因此「很自然地」成了《人間》的工作同仁。

現在回憶起來，官鴻志覺得《人間》所採用的報導文學的方式，是導引他真正進入寫作經驗的開始。雖然到人間之前，官鴻志的工作範圍一直與媒體緊密相連，但是新聞報導的方式

終究與報導文學很不相同。報導文學所強調的是寫實及田野工作的經驗，官鴻志形容每次去田野訪查時，行李中就好像放了一塊海綿，正準備用力地吸取很多不同的經驗。常常，每做完一個題材，回到台北，不但帶回了厚厚的一疊資料，更帶回了一顆沈重的心，因為與底層無法發聲、不受重視的小老百姓接觸的過程中，同時也背負了這群人想申訴卻無處可告解的冤與苦。

在《人間》工作期間，對官鴻志而言，陳映真一直扮演了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每當田野工作結束後，面對一堆資料，陳映真總會毫不吝嗇地提供他個人多年來從事小說創作的寶貴經驗。陳映真甚至還教了官鴻志一個書寫的密訣——將田野筆記上的資料分為A、B、C、D……等幾類，分別寫在不同的書卡上，然後再重新去思考，從A到C是否一定要經過B，而B又扮演了何種功能。有心從事創作的讀者，不妨試試看！

從生的材料到熟的材料，到雜誌出書，若要問那一期令官鴻志印象最為深刻，那可考倒官鴻志了，因為一回想起來，每一次的報導都有無法言語的酸甜苦辣。官鴻志半開玩笑地說，曹族少年湯英伸那次的報導，他一個人悶在家裡寫了十多天，去《人間》交稿時，同事見了他卻很驚訝的問：你跑去那裡了？怎麼曬得這麼黑。後來照了鏡子，發現臉真的有如被曬傷般龜裂了，可是他左想右想，就是想不出整天悶在家裡寫稿，怎麼會曬傷



人間十年

從狂飆人間

躍入寬廣的文化江湖

——李疾

文/蔣慧仙

「尚

未進入人間之前，我是屬於過度浪漫的人——一個狂飆的浪漫主義者，」李疾回憶。而對於當時人間的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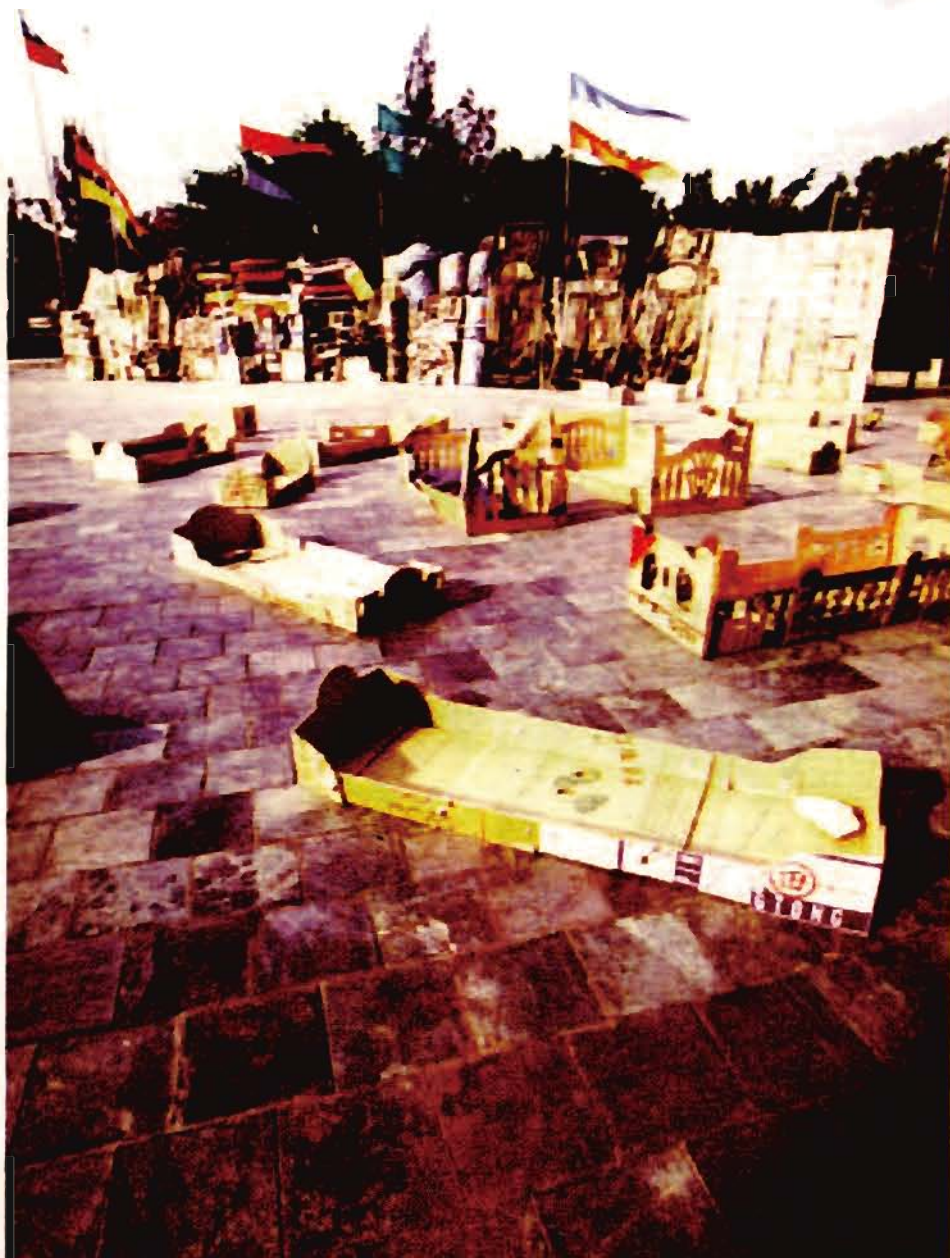
來說，彼此最大的支撐便是對人道關懷的理解與追求，以此揭露顛覆非人道的社會處境。

十年後回頭看人間當年的實踐所帶來的影響，「人間旗幟鮮明標誌社會報告、人道關懷的文字批判，為平面媒體帶來社會描述的新震撼，在政治、社會新聞、影藝花邊版面之外，開拓了調查報導的新空間。其影響更擴充到影像媒體的報導攝影，加強了電子媒體這類節目的正當性。例如張照堂的臺灣行腳系列。」李疾歸納，這些實踐在媒體中沈澱了一定的嚴肅意義。

「但不可避免的，解嚴後媒體的自由開放，讓嚴肅的報導文學的內在精神、份量與位置，被相當程度的稀釋與消費掉了，深度報導被量化成鄉土鄉情，人道精神的意義被掩埋。」這種趨勢使得許多人進一步思索「人道主義實踐」與「社會連結」的問題。「媒體有它的自欺性」，李疾的反省是，「揭發時搞得一團火熱，卻像新聞一般被消費過去就沒有了。」

媒體報導的朝生暮死，讓他思索其他出路的可能。李疾回憶，有一次和廖家展去埔里，看見當地在地的文化人士點滴努力默默耕耘，受到很大啟發。之後廖家展選擇前往新港文教基金會工作，李疾戲劇與民俗田野調查的背景訓練，成為他幾年後出去搞社會實踐與文化活動的基礎。

除了媒體體質的納編效果，解嚴後人間所凝聚的這股力量似乎不長反消，李疾認為這是「人間無法與臺灣社會發展出較為親密的、勾肩搭背的同志關係，也可以說是對於臺灣社會發展機制的誤判。」不論如何，「人間不應該是告別的年代」，李疾說，當初集結在人間的人所作的努力、他們的人道情懷與貢獻，不應被時代所掩蓋，「更不能說因為某些人現在的政治選擇，將之過去對臺灣的貢獻一筆勾消」。對李疾而言，當年辦雜誌的朋友以理想相濡以沫，抵抗強制的國家機器的壓迫，不見得是這一代的人能做到的。



(圖/丘德真)

一九九三年，帶著人間時期的實踐經驗，李疾成立民間藝術工作室，「從過去的記錄者變成被記錄者」他說，民間團體、宗教寺廟、地方文化中心成為參與的文化對象，把自己丟入更大的文化江湖。比較起人間時期實踐的最大差異，「這和過去拿筆替天行道是極不同的，當你不再是媒體代言人，等於把自己的保護傘拆了，開始進入更直接的社會利害關係，面對人們直接的誤解、歧視、不信任」。

李疾說，民間藝術工作室嘗試「創造文化的對話型態」，透過活動將文化的想法、理念導入民間互動。「中元普渡祭宗教藝術節」是一個長程的文化活動，嘗試將傳統普渡的慈悲內涵，具體的觀照到實際的生活層面。結合了傳統民俗陣頭、水燈儀式和現代藝術的活動系列，希望能為民眾帶出儀式審美的視野。「過程

中要說服幾個陣頭加入現代與藝術的表現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更必須從互動過程中檢驗自己的角色與作法」，李疾說。前幾年曾經發生招喚好兄弟的竹篙豎得太高、祭品卻準備不足而引起地方的驚恐，緊急動員鄰近地區支援物資的驚險狀況。

這些經驗，讓他更冷靜地從文化活動中看清楚自己的位置，更清楚地了解「文化不是表演、不是速成，也不是去追求偉大，而是和在地人的接觸中互動出來的。」他相信這種直截的社會介入，要比過去面臨更嚴格的自我檢查，從而打造更紮實的文化基礎。



▲圖為李疾。(攝影/賴淑雅)



▲圖為北縣中原普渡祭宗教藝術節。(圖/劉振祥提供)

人間十年

21

抵死不從朝九晚五

沉澱白色恐怖記憶

的藍博洲



初 說要訪問藍博洲，他謙虛地表示自己的經歷很平凡，沒什麼好說的。的確，他工作上的經歷不多，但也因為這種堅持，他是台灣目前少之又少的幾位全力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人。

在讀輔大法文時，進入著名的異議性社團「草原文學社」。大三當社長時，他邀請了楊遠、陳映真兩位不同時期的「政治犯」作家來演講。第一次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之後他又陸續接觸到魯迅等人的「禁書」，激起了相當的激動。而在同一時期，他因為讀

了吳濁流的「無花果」，而第一次看到有關「二·二八」的相關資料。

退伍之後，原本曾到〈南方〉工作，但是只做了一期，就因為理念實在不合而離開。之後經由鍾喬介紹進入當時已經創刊兩、三年的〈人間雜誌〉工作。在〈人間〉的第一個題目便是和「二·二八」有關的田野調查。據他表示，那時正值解嚴前夕的台灣，有關於「二·二八」的談論仍是禁忌，更別談市面上會有任何「二·二八」相關的著作。因此他還是從吳濁流的「無花果」出發，並回到台北大稻埕的歷史現場，跑了台中以南的很多地方，雖然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訪談，卻仍因諸多條件的限制而沒有多大收穫。因此，他只好重新拾起這個題目，回到資料中尋找線索。後來是因為一個機緣，有個當預官的朋友休假時拿了一本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的小冊〈「二·二八事件」

退稿的挫折，加上歷史的禁忌，讓他很想放棄這個題目。但總編輯陳映真先生的一句話，是鼓勵也是命令

文／高子琳

「真相」給他看，他第一次在這本由署名「謝阿水」的人寫的冊子中看到一個名字「吳裕德」。這本書中提到：「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共『台省工委會』份子台灣大學學生吳裕德所率領的暴徒數千人，以完全失去理性的手段，搗毀延平北路的警察派出所……，『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因此，書中結論，「『二二八事件』是在暴亂的社會條件業已形成，在經共產煽動而爆發……。」他當時想，如果歷史果真如此，那這名台大學生「吳裕德」便是關鍵人物了。

為了進一步探訪有關「吳裕德」的事情，他到北投向當時才從火燒島回來沒多久的老政治犯林書陽先生請教。林書陽自一九五〇年五月被捕入獄，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才釋放。整整做了三十四年又七個月的牢，是台灣坐牢最久的人，他

推測與「吳裕德」同時代的林書陽也許多少知道一點。結果林書陽並未聽過「吳裕德」，但卻提到另外一人「郭琇琮」。「林書陽先生對郭琇琮的描述，立刻抓住我那原先在歷史的迷霧中失去方向而受挫的心，重新激起了我探詢「二二八」以及後來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熱情」藍博洲在其一篇著作中寫到，「甚至我是在這個時候才瞭解到「二二八」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區別。」

透過林書陽的聯繫，他找到郭琇琮的遺孀——隱名埋姓四十年的林至潔女士，也因此在此「人間」二十一期推出：「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的足跡」。是幸運，亦是歷史的機緣，從那時開始他一頭栽進台灣那段被淹沒的歷史中溯源。直至今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湮滅灰飛的歷史逐漸在他的報導文學中沈澱出來。

完成「郭琇琮」的報告文學之後的他，因為無法再從這個領域中分神，便離開了「人間」，不過他仍不時回去幫忙專題製作，或是提供稿子。「人間」關了之後，他亦曾和鍾喬、關曉榮等人在自立早報做過一陣子的「人間拾路」的深度報導，用原本在「人間雜誌」工作的方式，每週推出一版專題，但後卻因自早改變經營策略而遭到裁員的命運。此後，他專心在報導文學的寫作上面，對從事正式的工作，以他的說法是「抵死不從！」

對他而言，影響他思想啟蒙的要算是八〇年代初期，亦是由陳映真等人搞的〈夏潮〉雜誌。從〈夏潮〉中，他確立了一生的信念，而〈人間〉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實踐的地方，也因為在「人間」開展了到現在他一直堅持的白色恐怖報導文學之路。

對於這條路的堅持，是出於對台灣史的好奇，「我的生長歷程是伴隨著台灣本土化的過程，」藍博洲表示，「以前在南方很多人說，研究台灣史最後會變成台獨，但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樣，反而是因為搞台灣史，我不會變成一個台獨。一直跟這些人接觸，大概是所謂的責任感吧！希望將這段史實盡量地呈現出來。」很多搞台獨的人說，二二八是由台灣的人搞台灣獨立，但是以他對歷史的瞭解而言，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他認為當時白色恐怖之前，台灣社會運動的風氣很盛，而且充滿一種社會主義的理想色彩，不會因為二二八而不感碰政治，一直到五〇年代才完全被國民黨給鎮壓下來。「這樣的情形與主流國民黨及民進黨的論述完全不同，為何這樣的歷史事實不能成為真正的主流，自然有其現實的政治因素。我一個人能作的只有這樣，至少留下另一種真實的歷史紀錄，讓以後的人能瞭解台灣戰後的歷史！」

人間十年





▲圖為去年來自亞洲十五個國家的民衆劇場演員，來台演出「大風吹」一劇。（攝影／賴淑雅）

不只是吃飽問題

鍾喬踏出國際

的草根實踐

文／蔣慧仙



▲圖為鍾喬。（攝影／賴淑雅）

十年之後回頭來看，人間是一個面對市場的刊物，它要拉出較寬廣的面向，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做太多的宣導。如果要說人間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我想這些人代表八十年代中期延續夏潮雜誌老左派路線的實踐。

很明顯地，陳映真當年對大家的思想上有很大的主導力量，源於老左派的階級觀點的社會分析，是人間的理論武器。當然，從事後的反省，同仁若能更具互動性，應當能對於問題呈現出更多面向的思考。

人間不想成為同仁性質的刊物，我們試圖讓一般人了解，人道是溫暖可接受的，特別是針對城鄉知識份子、教師，讓他們可以透過雜誌知道臺灣社會的內在運作邏輯，從而進行教育工作。當然，任何一個較具進步色彩的刊物，人們的期待難免更高，談「左翼」時，人們不會要求中國時報有什麼對應的社會實踐，但會要求人間不只是報導而已。它與被報導對象之間的倫理問題，受到更嚴格的檢驗。

人間的報導不是商品娛樂也不只是新聞，它的深度報導突破報社自由派言論的底線限制；另一方面人間堅持參與式觀察的倫理，和對象至少是經過長久生活和溝通過的，避免把他們異化成搜奇的對象。雖然仍有人批評人間是「用資本主義包裝，販賣社會主義的內涵」，但至少當初人間堅持了「尊重報導對象的文化態度」，也正是這種反省，讓人間的同仁清楚自己文化工作的定位，關心人的問題、關心草根勝於自己的藝術成就。尤其在今天事事講究要暢銷有市場的商品文化年代，這種文化態度在許多範疇都已經激烈的消失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間的實踐不該被扣太多的大帽子。

在全球左翼政權落潮與

長期親美反共的臺海格局下，解嚴之後，人間承續自夏潮對中國隱含的統的態度，就算不被帶紅帽子，被擠壓到邊緣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我自己之所以會從人間雜誌拉到和亞洲民衆文化連線的戰場，和上面這個歷史趨勢的思索有關。在人間雜誌的年代，一方面是關心臺灣本土、揭發並干預社會現實；另一方面，當時在統獨的意識形態上又是傾向於統的立場。兩者間的辯詰在九十年代透過和第三世界的來往，有了更深刻的反省。簡約地來說，實行中央集中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共，常會用國家被外來殖民的問題包圍作為內部殖民的合理化藉口，並對臺灣與西藏問題採取緊鎖態度。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被壓迫者的教學」的實踐，正是基於草根民衆文化思維，反抗政權內部殖民與極權統治的展現。我開始對過去國族主義的態度做調整，深刻理解草根文化與民衆連結的重要性。

再者，民衆文化工作並非只有第三世界的國家才需要。臺灣充塞經濟發展的現象，由於沒有飢餓問題，多數人以為追求金錢就解決其他的問題，人民創造力差、無自主性，在我們巡迴城鄉做工作坊時，許多教育工作者都反映有這樣的危機與需求。透過劇場做民衆的草根教育，去思索人對待自己和社會的態度，並找出表達自己的方式，是很有意義的。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人間當年辦得很辛苦，不論財務與人力上。初期並沒有訓練計畫，到後期才開始辦夏令營、冬令營，嘗試傳遞經驗與培育新手，但並沒有銜接得很好。從民衆文化的角度來看，培養生力軍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當年人間留給我的寶貴經驗。



（圖／書林出版社提供）

人間十年

23

►王墨林攝於毛澤東的畫像前。
(圖／張照堂攝，王墨林提供)



「當我回過頭來重新看《人間》，其實是現在的我在和以前的我對話，召喚我以前的幽靈。因為消失的過去，已不可能具體而細緻地重現，因此，我所談的歷史必然帶著後設的觀點。以後設書寫方式重現的歷史，並不因為它是『廢品』，而有道德上的錯誤；重要的是，我如何看歷史，我的角度和立場是什麼？」

在日本接受左派的洗禮

生長於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王墨林自稱自己是「戒嚴之子」，不斷在反省自己身體、人格、生命中的戒嚴因子。他對《人間》的反省，因此即從戒嚴的歷史系譜出發。

一九八三年，王墨林到日本留學。與戒嚴體系教化出來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世界接觸所受到的強烈震撼，使「戒嚴之子」陷入極度的矛盾之中。他離開了學校，和當地的左派學生一起從事社會運動，瞭解到經濟高度發展的日本社會背後所存在的不平等的階級問題，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參與左派運動，也接受了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洗禮。

「我非常感謝日本社會教育了我，讓我有一個全新的社會觀和世界觀。」在日本三年的日子裡，他看到了六〇年代女性主義、人權主義、同性戀、反種族歧視等顛覆舊思想、價值體系的運動浪潮，看到了脫殼而出、對政治、文化、經濟各層面皆有著深刻影響的法國學生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也看到了台灣在這個革命潮流及整個世界歷史中的缺席。

對「紅色中國」的重新認識，也開啓了他的視野。他發現，「以前在台灣談的『中國』是虛構的，甚至連『台灣』都是虛構的」，這個曾經在周清玉的《關懷》雜誌中工作的「台獨」

，在接觸左派運動之後，深為一個更巨大的、搞過轟轟烈烈、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所吸引，「當我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看到馬、恩、列、史的畫像懸掛在上面，激動地連眼淚都要掉下來……。」

一九八六年，王墨林離開日本，回到台灣。當時的台灣正解嚴前夕，處於經濟成長引致政治資源重新分配的政治激動期，黨外時代響起終曲，民進黨在社會的矚目下誕生。滿懷著社會改造熱情的他，並不想馬上找工作，而希望統作些事，實踐左派的理想，「現在想來，那時候很幼稚，但就因為有這種『左傾幼稚病』的階段，才使我的生命更厚實。」

用淺文本視點解構自己

經由朋友的介紹，王墨林進入在日本時就曾聽聞的《人間》雜誌工作，「我對陳映真早就久聞其名，他是我喜歡的一個小說家，我曾經聽說他因為經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而下獄，到日本後，瞭解了左派，對陳映真也就更加地尊敬」；初入《人間》，「當時真像是懷著如

為「骨連宮」劇照。
►裸體是對父權體制下身體、性禁忌的一大挑戰。
(圖／身體氣象館提供)



撕掉標籤

重新作人

「戒嚴之子」王墨林

文／李安妮

履薄冰的心情」，他說，「雖然工作酬勞很低，但在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吸引之下，讓我在《人間》一做就做了三年。」

「我很感謝陳映真，通過他，我得到一個如何切入社會結構性觀察的方法」，他認為當年陳映真對他文字的修改，對他的寫作有很大的幫助。在《人間》的同事中，他特別懷念死去的朋友王蔭林，以及同事間對各種社會現象、事件的意見討論，「這些討論都是影響我、促進我進步的因素」，對他而言，那時候生活上點點滴滴的快樂和學習，最令人懷念，也只有這些拼貼出來的記憶，才是最真實的。

重新審視在《人間》的生命歷程，王墨林對於自己在前中年期，還能有那種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式的熱情，感到非常慶幸，但對於當時所做之事，則持以否定的態度：

「雖然當時已經三十七、八歲了，但感覺上自己還像個小孩子，有青春、熱情、活力，卻不懂得我們面對的社會有多複雜，不懂得這不是個可以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正義／不正義的二分法來看待的社會。」

「現在回過頭看這些文章，都會冒冷汗。那時真是太講大義了，一談就是大東西，人類怎

樣、社會怎樣，但我對人類、社會瞭解多少？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又瞭解多少？以前受到陳映真的影響，我特別喜歡講冷戰，現在，什麼叫冷戰我都不清楚了……。」

「我從未想要將人間的作品集結成冊。如果它們可以成冊的話，那是因為那代表『戒嚴之子』的心路歷程：裡面有太多教條的、意識先行的、沒有物質基礎的空泛的社會觀，當初抱著小心戒懼的態度，深入到所謂的民間，回頭來看，只有工作的誠懇、用心可被肯定，其他都應該被否定掉。」

他反對用「正文本」的觀點來看《人間》：「在《人間》工作過的人，會肯定《人間》的重要性，會說《人間》是弱勢性、社會性的、清高、神聖、使命感很大……，這是一種非常『意識先行』的正文本的讀法」，他認為應該脫離那種已經被固定化、僵化成形的觀點，找一些空隙進去，探索性的重新拼湊人間是什麼。「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也就否定了陳映真、我自己和每個《人間》的工作者當時的看法」，對他來說，解構《人間》代表社會正義的神話，也就是在解構自己，而其實，「我要解構的自己，而非《人間》。」

叛逆後，繼續堅持

經歷過「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事件」，王墨林說「統／獨」、「左／右」是他們那一代的重要波動。反省過往，王墨林認為自己的「統派」意識型態，不過是將「統」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左派」、「反帝」、「民族主義」一堆模糊的符號、標籤劃等號罷了，「其實這樣的等號是有問題的」，他指出，當時他們對「台獨」的想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從基本教義的左派來看，台獨絕對被劃為大右派，雖然事實上也差不多，但在當時根本沒有辯證的餘地。」

一九八九年，《人間》停刊之後，台灣的統獨問題被推到最高潮，九〇年代蘇共垮台、東歐解體及中國的經改，更逼使全世界的左派進一步去面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問題。作為處在這兩股熾熱化爭議潮流中的左派，王墨林經常到中國大陸進行實地的觀察和瞭解。當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浪漫幻想逐漸消逝，他認識到在改革邊緣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非常地複雜，絕不是台灣統／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化約的觀點就能解決的。

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完成對人的解放的任務，反而透過對家庭制度的鞏固，加深了國家的威權性及對人的控制，這是源於中國文化上的大家長式的極權統治；以各種國家政策變相鼓勵結婚、譴責婚姻外的性關係、反對一切非生殖性的性、用法律壓制同性戀等，都是一夫一妻制與異性戀霸權的文化產物，而這和台灣社會的狀況並沒有多大的差異。這些現象使得他漸漸明白，問題並不單純地在於是否為社會主義而已，而開始更重視文化、個人和身體的解放問題。

反過來看台灣的統派，王墨林是失望的，他說，「台灣的統派還停留在《人間》的「正文本」時代，仍在用化約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來思考問題。然而，這些人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改變？如何面對中國處於資本主義化初期以暴力掠奪財物、累積資源、賣淫的各種問題，以及中共對人的控制權力慾的肥大？又怎麼面對台灣廣大的父權中心的壓迫下的女性、同性戀、原住民的弱勢處境？」從這裡，他反省到，台灣的左派是走不出來的。

對於「統」、「獨」雙方的父權性格，他都持否定的態度，而當他對兩者都不認同時，行動的空間反倒開闊了起來，「我認為自己是個積極的無政府主義者，要對國家這個怪獸提出諸種的側面攻擊，因此我的位置勢必會被排除在邊緣。這些側面攻擊包括對另類文化、藝術美學的實踐，包括小劇場的裸體、以及女性主義、同性戀和原住民運動，在這些實踐的面向上，台灣的左派是可以有很大空間的。」

雖然對以前許多的立場、意識型態有所叛逆，王墨林仍堅持自己是個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自己現在所從事的，如前衛藝術、小劇場、性別、同性戀運動等，其實可以算是「後人間」的工作，因為，「我

仍然站在關心弱勢者的立場，只不過這些議題較偏向文化上的改革和關懷。」他不忘對自己的批判，「當然，這些可能又是個標籤，也許以後也會被我顛覆，不過，大概要等十年後吧！」



▲從邊緣攻擊國家權力的文化左派，也要不斷地自我顛覆。圖為《昏迷宮》劇照。（圖／身體氣象館提供）



▲李男是決定《人間》編輯風格的靈魂人物。（圖／李男提供）

人間風格塑造者

——訪李男

文／葛蓀琳

興 沖沖地到「李男美術工作室」訪問當年決定了「人間雜誌」風格的主要人物——李男，沒想到卻碰到另外一位早期在《人間》擔任美術構成的「蔡雅松」？原來李男就是「蔡雅松」，那時還在中國時報，為了避嫌，當下隨意地在人間的工作人員名單中圈了幾個字，據說中選的是「蔡」明德、王「雅」倫、潘「松」松等人。談起怎麼和《人間》合作的，李男覺得是種緣份：「當時陳映真先生來找我，但我實在很忙，便推薦了一位朋友給他。陳先生相當尊重專業的意見，雖然成果他不是很喜歡，但仍然拿去打樣作了一份試刊號，當時一份刊物全部打樣就要好幾萬，可見陳先生的慎重。」後來包括李男自己在內都覺得不滿意，只好全部重做。在重做的過程中，他一邊做，一邊閱讀《人間》的文章，深深被其中對於「人」的尊重所打動，「我原先不知道它是一份這樣的雜誌，要是早知道了就不會轉給別人做……」李男回憶著，「在這一行二十年了，但《人間》的確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客戶，它是個值得去投入的雜誌！」當時他一設計出來，所有的人都覺得「這就是《人間》！」

在整個視覺呈現上，李男建議採用黑白的封面，也因為他覺得黑白照片的張力大於彩色照片，他堅持內頁用大量的黑白照片，甚至早期每個專題首頁的黑白開頁設計等，的確帶給讀者相當大的震撼。「幸虧有我的參與，使它少了很多的彩色；在照片選用上，也常因此跟攝影者產生爭執……」他略帶感慨的說，「但是過了一、兩年之後，有些人反應這種呈現實在太沈重了，而陳先生也這樣覺得，所以彩色的篇幅才漸漸增多，總之，是一連串不斷妥協的過程！」

「說實在《人間》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包括在做人的方面，這種影響其實很難說得清楚，只有自己知道。比如說有次我看到一篇文章很好，就自掏腰包設計、印製了那篇文章，廣為傳閱。我希望好東西大家都看得到，而不只是版權緊緊抓在出版商手中。」是受到了《人間》的感動，而讓他對生活的周遭細細地品嚐，甚至對流浪的狗兒，幾乎帶著一種宗教式的情懷，「《人間》對我而言，不只是份工作，某種程度上是使我進入了人生的另一個轉角。現在一面講一面回溯，真的覺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影響。」李男說。

他認為：「《人間》就像陳映真本人的翻版，真的，如果『陳映真』變成了一本書，就是《人間》！」唯一的遺憾是：「我覺得自己目前的狀況很不錯，但是卻沒有這樣的雜誌可以做了！」

人間十年

強調真實美學的報導文學

口述／鍾喬

整理／李安妮

報導文學與其他類型的文學在美學上有極大的差異，詩、小說、散文、劇本等文學、藝術的呈現，強調的是想像力，想像力即是虛構，虛構所產生出來的美學力量，是這些文學、藝術很重要的一個支點。相反地，報導文學則須以現實為基礎，其美學基礎不在於虛構，而在於真實。

真實的美學，大致可區分為報導與新聞兩種。**新聞**，通常指的是，針對每天發生的事情所作的立即而短暫性的一種呈現，而報導上則必須更廣泛而深入地探索各種社會現象。

報導文學的工作，可分為準備、現場、寫作三個歷程。

準備的功夫和後面二個歷程過程有很大的相關性。因為報導要呈現的是真實的美學，因此，對事實本身的瞭解、準備如果不夠的話，就會影響到現場的採訪和寫作的呈現。

事前的資料準備，首先要瞭解社會結構的發展，其次再針對某個議題作追蹤、瞭解和研究。不過，過度重視社會結構發展和資料準備也可能使報導者落入「意識先行」的危險，這也是《人間》的工作者較常犯的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之所以會在《人間》發生，主要是因為工作者在意識型態上，比較重視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容易受到預設立場的左右，將採訪的東西納入分析的大架構來看，而不將現場真實事件、人物當作寫作的主题。

報導工作的第二個歷程是報導者在現場中與真實事件、人物接觸的過程，這也是報導工作中最有興趣的部份，透過這些接觸的過程，許多辯證性的思考、反省，才得以產生。

面對現場，一個報導者會處在兩個狀態：一個狀態是記者的身份——記者的任務是要完成其報導工作，因此，必須不斷地做採訪、發掘問題，呈現在現場所看到的事；但報導者也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亦即，當他在從事報導時，要如何看待被採訪、報導、觀察的人？

解決這個問題較好的方式，是採取「參與式的觀察」。

如果報導者只站在記者的角色來面對被報導者時，她的位置通常會比較優勢，不論是因為被報導者為了讓事件能被報導出來，因此願意為報導者多說些話，或是因為報導者使用技巧來說服被報導者的這兩種狀況，報導者與被報導者的關係都不能說是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交流、互動關係。

當報導者真正參與現場時，才可能和被報導者採取一個較平等對待的關係，報導者可能會進入被報導者的生活，也可能會被排斥，而人和人較解放或和平的關係，通常也正是因為你曾經被排斥、也被歡迎，某些生活習性被歡迎，某些則否。

報導工作如果缺乏了「參與式觀察」的層面，相信這個報導本身並不會很深刻。另一方面來說，因為報導要呈現的是真實的美學，所以報導者多少會介入被報導者的生活，而我們要尋求的是，怎樣讓被介入者的生活真實面貌被呈現出來？這對報導者而言，是個很重要的反省面向。

基本上，「參與」和「觀察」是兩件矛盾的事，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報導者在從事「參與式觀察」時的重要倫理問題。長期的工作，是唯一比較誠實的辦法。關曉榮到蘭嶼一邊工作一邊從事報導，是個較能兼顧既能將某地的

重要議題用影像、文字傳達出來，同時也能兼顧記錄工作的倫理的較為成功的一個例子。

非常不幸的是，在商業體制下，幾乎很少有人能完整而無缺憾地完成「參與式觀察」的報導工作。譬如：在報社的工作者，必須應付社會大眾每天對新聞的消化量或消費，因此很難能不帶沒什麼目的地、單純與被報導者一起坐著聊天、談論天氣、感受生活的氛圍等，而這些事情對如何達成「參與式的觀察」卻是很重要的；雜誌也有同樣的限制，即使是《人間》，多少也需要考慮到市場的問題，而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來做。

報導文學工作的最後一個歷程是寫作。報導文學的寫作文體，介於新聞專題與小說之間，亦即，建基在事實的基礎上，透過小說的主題、情節、角色等結構來呈現報導的內容。在這點上有一些爭論，有人認為報導文學應較接近新聞，雖然運用小說的技巧，但不應調整場景、人物等；有些人則認為，我們要盡量避免扭曲別人的意見，但未必要完全依照事實，某些報導中的角色的談話，可以不是被報導者當場說出來的，而是用整合資料的方式來取代，另外，也可將意見相同的數個邊緣的角色整合成一個人，這些都是讓報導更加生動的手法，而非故意扭曲事實。

台灣的報導文學歷史可回溯至柏楊的《異域》，其次是七〇年代高信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時所做的〈徘徊現實與邊緣之間〉系列，這些系列報導與《人間》較不同的是，它們多是作家對較陌生、偏遠地區的感懷或疏懷的呈現，而較少提及這些偏遠地區在整個社會的結構性的位置。《人間》之後，正值解嚴後媒體的蓬勃期，因此提供了一些報導攝影和報導文學的工作機會，可惜的是，媒體對這種文體的作品消耗量雖然很大，但卻未相對地提供工作者充分的物質條件，所以很少人能夠持續地從事這些工作。

目前，報導工作在全世界普遍都很缺乏，因為，這種工作方式帶有較高的反省性，而且不論是內容或表現的形式，對消費的媒體而言，都是較不具華麗性的，被人接受的可能性也因此較低。

報導工作過程中在現場與人互動的反省與學習，可能是一點一滴的，但卻是最可貴的。一個年輕人如果要從事報導工作的話，最好不要追隨過去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要推翻我前面所說的這些原則，因為，只有誠懇而反省的工作態度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太相信某種工作方式，就會被那種工作方式綁住，但相信的如果是一種和人的基本對待，那永遠會是重要的。



圖／野人

開放對談的空間



(上文接十五版)

觀眾一：

敝姓郭，來自台南，我覺得今天是一個早就應該出現的焦慮對話。不同世代、不同位置的人都有一些不大搭調的焦慮。我的焦慮像是讀「酷兒」專輯時裡面所提到的血腥暴力一定和一個異性戀男作者寫的相同血腥暴力意象所得到的評價完全不一樣。同樣身份的焦慮就像以前楊照和張炳芬的辯論，或是傅大为、郭力昕和何春蕓的書的檢討裡，都曾經被扣上父權遺毒的帽子；像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我想不管統派或獨派的人都應該非常尊敬，但是藉著這個對話的機會，我覺得陳映真把所有的台灣人士都同化為親美不然是親日，讓人讀的時候覺得很不舒服；對於傅大为我有一個小小的焦慮，就是讀他的文章一定要準備一本英文字典，有些字可以明明白白寫出中文他卻一定要寫英文，這是我對他唯一的焦慮。

觀眾二：

我是張麗志，大學時參加台大大聯社，我是九一年進大學的，有一些看法和紀大偉很像。譬如有些人說學運沒落了，可是我的看法是，的確在九一、九二年之後大型的學運漸趨稀少，但就以台大來說卻出現了更多不同的社團，如環保社，他們以不同的分工進行不同的社會運動，學運不是沒落了，相反的是以

不同的策略在進行中，換言之這是一種多元的情境，但是的確我也感覺到學運裡一種潛在不用功的焦慮，不過這個問題牽涉到學運的自主性。我對在場參與人是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最近台灣的文化論述場域有一個分割非常強烈，尤其是島邊的「假台灣人」專輯，刺激很多東西出現，但是我看到這裡面卻有一些惡質的對話、非理性的對話出現，我覺得如果那些批評「假台灣人」專輯的人以後現代主義的色彩，卻把台灣作資本主義的批評，就很容易忽略了其實台灣裡面有支持女權、支持工運的，但在那些人的批評下卻變成右派的法西斯，很多都是情緒性的字眼，把對方拿到一個框架下做批評，想請問在座如何看待這樣的論戰。

觀眾三：

我很少在洪凌或紀大偉的書裡看到統獨的東西，統獨在王浩威以前的世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我今年三十歲正好介於兩世代之間，很想知道我以下的世代是怎麼看待統獨問題。

陳映真：以國民黨之名

關於獨立運動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可能會佔很多時間，離開這個話題，我想講兩點感想。第一個感

想是邊陲中心化的問題，譬如在這次選舉後，三黨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尤其是原先鬥爭非常厲害的民進黨與李登輝國民黨之間的聯合趨勢。民進黨早先以疑似邊陲的姿態提出中國論述之外的台灣社會、台灣民族、台灣國家的論述，而李登輝政權所代表的台灣本地經過四十年威權體制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與官商資產階級的政權正式誕生，而舊有的武裝集團的國民黨像水蒸氣一樣地消失以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兩者越來越相像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國民黨的消失，以及只剩下以國民黨之名存在真正台灣人當地的官商資產階級的政權的形成。這個現象在社會科學界沒有比較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在平常的說法裡常以國民黨如何如何來含括，很多東西還停留在舊時代。而在民進黨與李登輝國民黨因舊有國民黨的復出危機威脅下面漸有聯合趨勢，在這樣的分合中，學術界太過於與當代政治潮流一致、太過於為政治服務，所沒有留下學術界獨立的空間，這是戰後學術界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二個感想是要回應王浩威，我的確在很早就提出一個想法，那就是台灣社會論出現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雖然〈台社〉的出版的確令人欣慰，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比較體系對於台灣經濟史、亦即從史的唯物主義觀點所分析的台灣社會。我認為從某一個觀點來說，只有台灣社會論的出現，才能出現台灣變革論，決定要改良或是要革命，這才是比較科學的方法。

對於剛剛幾位年輕朋友提到的性別問題、同性戀議題方面的為我讀得不多，我的觀察是恰恰缺少台灣社會史的脈絡，以性別問題的例

子來說，基本上是以發達國家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的焦慮，來代替台灣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時期乃至現在社會發展脈絡下的婦女的問題，而從台灣新文學運動裡大量關於女性的議題的例子來說，台灣作家出奇地關切，同情當時婦女的命運，這方面在當代的女性運動裡有沒有被充分地關切到我不知道，但我所聽到的語言是有很大距離的。

這讓我益發覺得台灣物質歷史的重要，而不是道德論、感情論的台灣，沒有這樣的分析就會常常受到外來思潮的衝擊，在然後在文學、論述上流行一陣子過後即煙消雲散，對左翼的思維和學術的積累造成很大的影響。

傅大为：經歷統獨就好

關於剛剛有觀眾提到何春蕓、郭力昕和我寫的書評一事，我覺得何春蕓那本書很有意義所以我才花這麼大的篇幅寫書評。現在台灣文化論述的問題，我曾和顧春賢討論，我們都習慣於寫極端極小的東西，其實很多意思無法寫清楚，或是寫的時候是為了當時突發的事情，戰鬥性地寫一些文章，很快就會被時代的潮流淹沒掉，除非你是站在一個很重要的發言位置或媒體上；而何春蕓很認真地花了八個月時間，以一本書的篇幅來講事情是值得鼓勵的，因此寫了一些書評，後來郭力昕也針對這個在中時發表一些文字和一些批評，台灣的書評有時候太敏感了，好像有人有些批評時，就會被認為是文壇在鬥爭。

人間
十年



上文接第二十七版

至於本質論地批評台灣的問題，我有相當程度的贊同，但是這個問題不只是那些批評者的問題，因為這些〈島邊〉的朋友過去也曾被台灣朋友以本質主義的方式帶帽子，說他們是統派云云，最後就變成惡質性、情緒性的對話；其實統獨這個問題，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去經歷這個過程，而經歷過之後就應該跳出來，不需要在裡面糾纏，台灣的邊緣文化論述亟需要非常多人去做出很好的新的東西出來，而不是一個老戰場打了二、三十年的仗，還是在裡面糾纏不清，製造新的敵人。

王浩威：假台灣人

「假台灣人」專題原本的用意是希望把統獨問題這樣一項被嚴肅地拿來討論的問題，用一個比較嘲諷的方式來處理，所以可以看到施明德、許信良等人的照片被拿來和裸女、機器戰警拼貼在一起，但是原本希望的嘲諷用意，後來讀出來的效果，很多朋友對其中嘲諷台灣意識、台灣民族意識相當不滿，包括楊照等人，我們也鼓勵這些不是參加〈島邊〉的朋友把意見寫出來，不過可能是太忙或是怕寫出來會被〈島邊〉收編，聽到的意見很多，就是無法把它們凝聚成一個有討論性的東西。

洪凌：消滅差異的集體性學運

我想對剛剛的討論提出一些回應，我寫了一些關鍵字，第一個是「酷兒很 bloody」就是酷兒很血腥，在任何的位置之前我就是一個創作者，而在創作者的身份上我必須很先驗、很霸張地說，我寫的任何東西在寫的那一刻可能不為任何的運動或策略而寫，而是在寫後的檢驗才意識到，寫的當刻就是一種寫作的愉悅或是自我投射的過程。

另外一個是關於學運脈絡的問題，我是在八九年進大學，那時候有去過中正廟，因為沒有加入任何團體，就在場子裡晃，看他們的表演、野百合等等，當時我還沒有紮實

的女性主義和同志論述的底子，但我已經覺得這樣的學運是試圖把學運集體化或是個體化到一個消音的地步，所以學生就是學生，沒有階級、性別、偏好甚至認同的差異，學運在當下製造出來的是一個集體化的狂喜或暈眩，其實是在削減差異；這導致後來我思考自己要做的運動絕不會是依當時的學運脈絡，這和剛剛有人提到我的作品裡沒有統獨問題是有相關的，因為在一個巨大化的是或非、左或右的立場上，已經削減了我所要關切的細部的差異。譬如我會說我是比較支持台灣獨立的，但這是要加劃號的，而非絕對的支持，如果在台灣獨立的陣容當中有任何的性別宰制或權力脈絡的話，那會是我最先第一步要關切的點。並不是我們不關心統獨的問題，相反的是無時不刻都在關注，只是我們會選擇從自己最切身的細部問題著手。

紀大偉：對 Totality 敏感一點

剛剛陳映真講到脈絡、context 的問題的確很重要，我覺得其實關注女性主義或是同性戀論述的人或許做得不夠但絕不是沒有想到。另外剛剛的討論有一個關鍵字是 totality，這個字似乎要把每個人都捲進去才行，好像要有一個很 total 的歷史，好像要有一個很 total 的議題，你要靠邊站、要選是或非，若沒有的話好像你就在外面，這個東西必須被質疑、被鬆動，因為剛剛在場也有相同的共識，要重視歧異、不要以本質論來扣帽子，那是不是能對於 totality 敏感一點。

觀眾四：

第一個問題是針對陳映真，〈人間〉在台灣從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的轉折之間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人間〉真的要復刊，你對她的面貌有什麼想像，她要怎麼對現在的台灣社會發言，譬如要如何看待新新人的問題，而你個人的立場堅持、歷史視野的堅持，要如何面對

多元、後現代的現象，最後一個問題是，你三十年來的堅持，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它在當代的條件又是什麼。

觀眾五：

想請問陳映真，到底是什麼原因使的左派的傳承越來越薄弱，是所謂基礎建設的缺乏嗎，另外我想問的是到底有沒有所謂全面性左派的方式去進行或批判，不只是批評而是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有沒有可能，因為我發現如果這種東西沒有可能的話，其實對於左派的想像會不斷地萎縮，萎縮到最後就會變成沒有根。

觀眾六：

在解嚴之前的左派論述的傳統包括鄉土論戰，以文字、文學為主的表現形式，以及著重於關心國家宰制的問題，到了解嚴之後的發展，關心國際觀、影像形式逐漸取代原有形式時，以文字為主的傳統還能生產什麼樣的意義。

洪凌：非人觀點

今天的座談題綱上有句話說：「從人間開始但並不結束於人間」，並不是要去反對傳統的人本或人文主義的東西，但或許我們應該開始想什麼是「非人」(inhuman)的東西，而非人的東西向來都是被摒除在體制之外，不管我們自己有沒有邊緣的焦慮或邊緣的驕傲，但是不可諱言的是在場的人之外，有很多甚至是在一個最基礎的物質環境上都是被當作 inhuman 來對待，這應該再一次重新被提出來。

王浩威：島邊倒了也蠻好的

剛剛有人說怎麼都在講自己的歷史，事實上我覺得左派人士也要 coming out 的過程，更明顯地把自己的立場標示出來，不必要在像白色恐怖時期隱晦自己左的立場，把左的歷史記憶不斷地建構起來。並不是說左的問題比同性戀或性別議題重要，但是相對而言當女性運動或同志論述開始有一個聚集的點時

，反而左的聚集點一直都不存在；在西方左派運動與性別、同性戀有很大的衝突，因為左派想要主導這一切運動，但是在台灣卻不一樣，只有少數人會承認自己是左派，但從來沒有左派運動的出現，所以姑且不論哪一個運動優先的時候，至少左派運動要想法先出來。

左派運動的期待其實像是遍地烽火，不管是什麼樣的團體、什麼樣的理念，大家可以各自去辦自己的刊物，就像蔣慧仙、洪凌或紀大偉所提到的結盟，大家各自有個山頭，當你還若小的時候，其他刊物可以供你寄生，可是當你足夠強大時其實慢慢就可以獨立出來，策略上互相獨立出來，遇到事情時就隨時結盟，這樣的關係可能也比較不會陷入什麼比較優先的緊張關係中，所以〈島邊邊緣〉這樣的後正文狀態並不代表島邊固然地就要走向那個方向，但反過來說，當左派的东西慢慢看不到時，也不代表島邊就要變成左派的文章。所以像島邊這樣的雜誌或其他的刊物倒的時候，以前我會覺得很遺憾，慢慢地我覺得其實代代有新人、代代有新刊物出來，如果她的時代任務完成了，倒了也蠻好的。

傅大為：新世代的綜合沙拉

我並不贊成用〈新左評論〉這樣的名稱，因為那樣的論述就容易被限制在英國新左的範圍之內；我個人覺得基進性這樣的東西應該是包含比較寬廣、比較大的範圍，而且每一個時代如果說要革前一個時代的命的話都有它的基進性在裡面，不一定只考慮有沒有在承襲一個左派的傳統。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一個十九世紀的猶太人馬克斯所寫的東西去傳承什麼，因為基進性在每一個時代碰到不一樣的問題時都有新的東西出現。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用左派當作象徵，相對的我覺得重要的是基進和邊緣的書寫以及開拓基進和邊緣新的東西。剛剛王浩威說左派有 coming out 的人只有陳映真一人，但我回國之後碰到很多自稱是左派或是進步人士，其實左派來自西方，西方面對像蘇聯垮台、東歐解體的巨大變化，左派的思想時至今日怎麼辦？我覺得反而沒有 coming out 的是去批判、檢討左派的過去的思想、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倒覺得新世代講的是綜合披薩和綜合沙拉，我不曉得到底是誰好玩，誰沈重、嚴肅；但紀大偉剛提到：今天談女性主義、同性戀很容易被人家說成是種流行，如果是左派、新左則否，這我想未必。以前在台北有個說法，有個小冊子就叫做〈如何在五分鐘內變成一個左派〉，後來，像時報出版社出〈資本論〉，前面還有一個告訴我們怎麼讀的導讀，那時我的感覺是：〈資本論〉在台灣已脫離了過去那樣的基進性。我不知道這要怎麼看，而我的感覺是：過去左派、新左在相當程度上是被收編的，像〈中國論壇〉等等就曾談過，我想這類問題其實滿複雜的。

下文接第二十九版



(上文接第二十八版)

現在，新世代提到「歷史的斷裂」這些東西，我想最後就提一下。我的感覺是這樣：人的身體除了是情慾身體之外，也是個歷史的身體。你要對歷史作斷裂的話，可能要狠心地把一隻手斬掉。我的意思是說：要作歷史的斷裂，我們通常要對歷史有相當理解之後，才能比較清楚你到底要砍左手啦、右手啦，還是左腿、右腿。

因此，我覺得在作斷裂的時候，不免還是要對歷史有些瞭解，才能決定斷裂到底是在那個方向，那個部份？不然就可能給人家一種感覺，就是「反正你們這套東西我們現在不管，我們要走一個新的時代，你們那套東西是你們時代的東西」。可是這樣子我也覺得是一個損失，因為在台灣基進派的發展上，其實前一個世代跟後一個世代、跟好幾個世代有很多的東西是有可能互相分享的。

陳映真：

我只是一個稍有進步性的小資產階級。

首先，在文字記錄方面我從來沒說過我是一個左派。我記得出獄後在一篇分析自己的文章裡面，我把自己歸為一個稍有進步性的小資產階級。

這不是什麼謙虛，而是這麼多年以來，我心目中有兩種左派，第一種是思想上，在知識上影響我的，不管國籍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的一些人物。第二種特別是最近五年以來，我從事台灣地下黨時代歷史的研究，所謂民眾史發掘裡，我碰到另種貧困的、桃竹苗地區的客家農民。在那個時代風雲裡面生活過，一直到現在。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是共產黨啊！」，看他的樣子又不像在開玩笑，表情肅然，我都不知道要怎樣反應。

說到我自己的認識，由於我剛剛說到台灣這種特殊的經歷，容許我這樣講：台灣其實沒有左派！不是

沒有過左派，至少是1950年之後就沒有我心目中意義的那種左派，區區在下更不敢以左派自居。

台灣的左翼運動大概有四個波段。第一個波段大概是1920年以後到'31年這段期間。當時，台灣跟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主要的抵抗精神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由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不過在台灣它的強度沒有向朝鮮、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那麼強。這有其歷史原因，我不在這裡贅述。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只有三年的時間，沒辦法發展出左翼的傳統，當時有幾個原因：第一，第三國際的威望太大，因為它是第一個從理論變成國家政權的國家——蘇聯，所以它一切的理論權威可以說是支配著全世界。由於歷史太短，當時在台灣鬥爭、實踐，基本上也沒那個時間、餘裕。像蘇新、謝雪紅、黃富德這些優秀的人整天忙著重新組織，而且基本上還是在知識份子的組織上，沒有真正的進入到農民、工人階級。這個黨在'31年全面受到鎮壓，直到1946年另一個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發難，這兩個波次中有相當密切的聯繫。雖然中共來台後的組織方針是盡量不要找過去的舊台共，這倒不是因為什麼中國派、日本派的差別，而是因為在組織方針上，這些在日據時代實踐中已經露了頭臉的人若在納入組織，會是件非常危險的事。可是隨著內戰的激烈化，這個原則都被打破了。像蘇新、謝雪紅、簡吉、趙崗這些過去農民組合跟台共的人都被吸到地下黨，因為它們對山地、農民的問題特別熟悉，台灣地下黨已經沒有時間再去徵，把這道菜滿滿燉出來，以致招來'49年後全面的破滅。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剛剛提過這時期地下黨的任務不是發展對台灣的研究而是迎接解放，按照中國新民族主義革命的綱領完成中國解放，所以當時地下黨遠遠沒有看到1950年以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長達四十年的絕然斷裂，而不存在著研究台灣社會性格的問

題。這個肅清運動之後，所有的左翼關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論述就從此斷絕。

斷絕以後來了另種新的科學，就是從美國來的社會科學或自由主義的東西，支配了台灣長達二十年之久。'70年代保釣運動的左翼，也不過是對過去的恢復與補課。這些留學生突然覺得中國革命這麼重要，原來跟外國學生看契·蓋瓦拉、卡斯楚、胡志明、毛澤東、周恩來一樣非常興奮地去看中國的革命，讀三、四〇年代的小說，去補那段課而已，基本上對台灣的局勢或台灣整個社會發展，也沒那種心情或需要去看待，很快的這個運動趨於沒落。

歷史地看起來，這個歷史可以說明台灣的所謂左翼傳統為什麼這麼弱質？第一，作為一個島嶼在絕對的白色恐怖之下，大約是槍斃了四千人，使八千人坐牢，這並不是關了哪些人，而是整套系統的毀滅；緊接下來，'50年代第一次外來思潮的侵襲，自由、民主、議會政治、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純粹主義，這是'50年代的運動。雖然有一種近乎奇蹟的、跟隨著'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總的反省運動所感染的保釣運動左翼的反省。基本上，持平地說，它在思想、學術上的累積並不大。

到了現在，'80年代我認為是另一批也許我願意用括了括號的左來概括這個世代，加括號並沒有並沒有輕視的意思，而是跟前面三個波段比較起來，這次'80年代以後傳過來新左的東西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跟過去歷史的議題不相聯繫。很多都是在台灣接受保守的教育，然後一撞撞到學院的左翼，很多很多的論述非常興奮；有些人可能受到家庭、階級背景的限制，對自己的家族、自己的歷史在還沒有做好反省反思的時候就進去。

我這次在檀香山就深切感覺到學術會議的場上，大家都非常流利、順暢甚至可以開玩笑的方式來討論很多的問題而討論的不錯。但當你私下跟他談生活的問題，談自己的政治選擇時，我第一次非常驚訝地感覺到，他做為職業的學術工作的左翼語言跟他私底下思想的保守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這是在過去的所謂老左派身上看不見的問題。因為我在那裡也見到來自南非、印度，年齡約五、六十歲的老左派，跟他們這些較年輕、三四十歲的對新左翼的各種語言、詞彙均能使用得朗朗上口的人有相當明顯的不同。

因此，我想台灣左翼運動的弱質性可以從歷史的回顧中找到其緣故，但這倒不是說一定是老左派才有價值。不過，作為左派、作為它思想的議題，我想是不是就只是作為常識或知識應該去尋找台灣共產黨，或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28年綱領裡頭台灣論跟'31年的台灣論等等，不是一定要繼承、去接續而是作為一種知識的體系。我想，對那些東西不熟悉並不是不對，而是會不會有些缺陷、有些破綻也說不定，這是我對左派一個很簡單的談話。

關於〈人間〉雜誌的問題。萬一，有那麼一種機會，人們可以再度復刊時會是什麼樣的角度？基本上

，我想還是一樣的。不過，因為時代不一樣，第一個改變我猜想是更加理論化一點，可是我們不會用理論來代替我們用形象語言來表達的這樣一個職能。

第二個可能有的改變是：在人間末期，我們已經碰到一個瓶頸，當1980年威權體制結束，解嚴時代到來，大量社運爆發之時，我們非常興奮地在現場拍照，不過時常在洗出來後就整個傻眼了，因為所有的照片都是拿個牌子，寫著恨、痛、怨，綁著白布面露怒色，看起來都是一個模樣，這樣我們就開始反省。

記得我們在報導環保時都非常無助，這個環保從1960年代就有了，但陳情、哀求都沒有用，今天我用石頭砸他之後也沒有用。大概記得裡面有個題材，在東部有個小小村莊，那裡有條清澈的河流，那些人就在那河流旁邊長大，後來發現有人把垃圾堆在那邊，有人電魚，所以那些熱愛這條跟他們生命與共的小溪的小村莊的人，自動組織起來釘布告欄，告訴人們不許在那倒垃圾、電魚，什麼時候不准釣魚，春夏秋冬每個家庭輪流值巡邏。這樣的故事寫起來就不是恨啦、怒啦、怨啦！而是非常溫馨的，關於這條河流，關於他們童年記憶的非常形象。

第三個，我想我們會跟讀者一起商量解決的辦法。「你能作什麼？」當你碰到污染、生態、環境，或少數民族或青少年、同性戀的問題時，你該怎麼辦，做為同性戀的父兄、姊妹、老師你應該怎麼看待、認識這個問題，怎樣幫助他、讓他們度過這種危機的時代。另外，〈人間〉雜誌可能發展成各個社區運動很好的朋友，什麼地方有問題，不要去引導也不要主事，可是做他們最好的朋友，跟他們一起為了他們社區具體個別的問題來做。只是〈人間〉復刊的機率啊，可能在零以下，很抱歉。

王浩威：

說左以便認右

既然大家都界定了左派，我就先解釋一下。第一，我想這是我跟陳大哥一直很不一樣的，陳大哥想像的左派都是神聖左派，我的左派當然是他括號裡面的左派。我會覺得台灣目前這個階段裡面，還是必須要講左，才能把一些問題突顯出來。

如果不講左就沒有又的存在，所以，我會覺得說不管你是在學院裡頭講，按照西方的進步狀態來說還是以很保守的方式在講左，但在台灣目前狀況之下，至少到這個階段還是很重要、很有意義、很有必須去做，而且可以很生活地去做，這是我跟陳映真先生一直很不一樣的。包括以前我們都會講：也許該開始思考「快樂左派」是什麼樣子的生活方式等等。也許台灣的歷史的社會的整體分析還沒完成，但我覺得屬於文學的戰場，屬於其他文化的戰場還是可以展開的，我覺得，不管以後會不會證明這些不重要，但有瑣碎的事情可以在手頭不斷的實踐，可能是最重要的。

美術／王錦華

★廖瑞章《廖瑞章各展》

時間：12.15 - 1.7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讀曰：明信片很漂亮，讓人想到日蝕、月荒；新樂園是報馬仔的常客，所以就相信明信片罷！

★潘煌《海角天涯》

時間：12.16 - 1.7

地點：形而上畫廊

讀曰：形而上這次展出可不形而上。潘煌記錄澎湖、東北角、淡水、金瓜石、基隆港...的自然風貌，在昏黃色調中的鄉土牧歌。

★呂怡瑩《影像日記——巢·追思系列》

時間：12.22 - 1.6

地點：美國文化中心

讀曰：「巢」與「追思」，非別為呂怡瑩在西班牙求學階段的兩組作品。盒子和抽屜的空間運用，及黑白照片、針、郵票、玻璃、釘子、蠟燭等等，皆是她的內在情感及對環境變遷、生命際遇的感受和思考。詩化的空間裡，一個女子影像日記的告白。

★鍾耕略《自然的聲音》

時間：12.10 - 1.8

地點：家畫廊

讀曰：旅法的鍾耕略，注重光影的照相寫實，山水溪石的模擬自然，大幅連作的視覺撞擊。

★黃銘哲《夢魘》

時間：12.16 - 1.14

地點：市美術館301室

讀曰：符號的夢魘、色彩的夢魘...，也許，也許還有關於叉子的夢魘。如果你對於抽象繪畫沒有那麼大的夢魘，也許你可以試試去看看黃銘哲的《夢魘》。



性別／李安妮

★同志《談同性性騷擾、強暴、亂倫》

時間：12.17（日）14:00 - 17:00

地點：Locomotion cafe

電話：02 - 7066321

★影片欣賞《Kahlo》+ 吳瑪利《女人的生命與創作》

時間：12.16（六）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02 - 3638244

若說墨西哥女畫家費達卡羅（Frida Kahlo）以身體作畫，應該是很貼切的，此影片不僅介紹卡羅的重要作品，更讓我們瞭解她在純潔與致命間擺盪的一生；以女性藝術創作著名的女畫家吳瑪利，將帶領我們觀看她的一生，以及女人的生命歷程和創作的關係。



★玄門藝術中心《上海之夜化妝舞會》

時間：12.16（六）17:00 - 19:30

地點：北縣五股成泰路一段189巷「山水宮廷」

讀曰：由邀請的藝術家及現場來賓展開一場張愛玲式的上海三〇年代的化妝遊戲。三〇年代的聲光、三〇年代的服飾造型、三〇年代的飲食文化，追憶和神秘浪漫的情懷，或許，你會發現屬於你的張愛玲和胡蘭成；還有歌聲悠悠的周璇，情詩篇篇的徐志摩與陸小曼。

音樂

張育章



★B-side · 耶誕舞會

時間：12.24 (日) 19:30 開始

地點：B-side (台北市愛國東路71號B1)
電話：(02)3511607

改變經營方向的B-side，耶誕夜以招牌樂團飄飄，Diddax 為號召，爭取台北另類痞子、人渣前往頂禮膜拜。也許該找粘利文去當客串DJ，讓大夥兒過個真正詭異、印象深刻的異教聖誕吧。

P.s. B-side 徵駐唱樂團，意者逕洽：田小龍

★大大樹音樂雜誌：亞洲音樂之旅 - 日本與韓國

主講人：陳俊斌

時間：12.16 (六) 19:00 - 21:00

地點：大大樹 (台北市永康街42-1號)

電話：(02)3578648

羨慕極了大大樹的小小天地，它讓報告人無須擔憂曲高和寡，聽眾屈指可數的冷清場面。如果叛客們面對面挑釁的表演讓你怵目驚心，那這裡的 music chat 將令你無處可遁舉旗和談。

★阿福、老哥·現場演唱 (自己搞歌 Part II)

時間：12.17 (日) 19:30 開始

地點：漂流木

電話：(02)3657413

哇！自己搞歌怎麼變成自己人搞歌了呢？挖鼻孔、搥耳屎別具一格的 Beavis & Butt-head 們還待在家裡幹嘛？幹掉那些 suckers，自己來吧！

★另翼岸讀書會 - 叛客 (Punk) 的源起與特性

主講人：張育章

時間：12.21 (四) 19:00 - 21:00

地點：台灣渥克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10巷1-1號1樓)

電話：(02)3680754

別懷疑，就是區區在下我報告的，內容、品質無須多言上回談過1976年以前唱片圈裡頭的種種暗潮與 pub rock 的抬頭，這回則著重在叛客自身特點上頭，想在台灣唱片業景氣低迷的時刻覓得金母雞的，不妨到場聽聽。

★阿福、濁水溪·現場演唱 (自己搞歌 Part II)

時間：12.24 (日) 19:30 開始

地點：漂流木

電話：(02)3657413

每逢聖誕必有驚人演出的濁水溪這回將打著出片的彩頭與你同歡。他們說：「聖誕快樂 gingle bell 啦... 天天快樂 gingle hell 啦！平安夜你要做什麼，下班之後要去跳舞，為什麼你不告訴我，我知道你想幹什麼..... 我要和你幹一炮啦... 快樂一下囉.....」，小心這些飽懷鬼胎的傢伙！



喜年來歡樂大驚喜

50元
折價券
1張
660份

金牛角
玉米點心
(小盒)1盒
2640份

200元
折價券
1張
220份

100元
折價券
1張
440份

凡促銷期間於OK便利店購買
喜年來系列產品(禮盒除外),每滿45元即贈送
刮刮券1張,集再送、多買多送、送完為止。
集5張銘謝惠顧,再送喜年來鮮蔬餅乾隨手包。

喜年來
鮮蔬餅乾
隨手包1包
8800份

喜年來
菠菜餅乾
隨手包1包
4400份

蛋捲隨手包
1包
2640份

※中獎者,限OK便利店兌換獎品。

活動日期:84年12月1日~84年12月31日

